



2010年1月31日第2期

总第四十二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刊特稿

[何 蜀 墓群的记忆](#)

[郑志胜 武斗“尸长”忏悔录](#)

[赵晓铃 血腥的花季](#)

[韩平藻 重庆815派文革墓群中的反到底派死者](#)

[陈晓文 关于重庆“红卫兵墓园”墓葬人数的再考证](#)

乱世民情

[东 夫 我曾是官办红卫兵](#)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自相矛盾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五](#)

小资料

[唐金鹤整理 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死亡人员名单](#)

[唐少杰整理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本刊特稿】

编者说明：2010年新年伊始，媒体公开了重庆市政府于2009年底批准将重庆沙坪公园内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以“红卫兵墓园”之名列入文物保护名单一事，引起各方关注。本刊特发一组稿件以帮助读者了解该墓群情况及相关背景。

墓群的记忆

何 蜀

1969 年 1 月，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民众自建的武斗死难者墓群，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莹的修建。

据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长期专门研究的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统计，从 1967 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 113 座墓莹（据另一位墓群研究者、退休中学教师曾钟继陈晓文之后的调查，墓莹数量已经超出这个数字，有 130 余座）。其中，除去个别没有立碑或碑文已经风化湮灭的以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仍有碑文资料可考的 92 座墓中，安葬了 345 人，加上那不可考的墓中的死者，估计整个墓群共埋葬有约 400 名死难者（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6 页）。

这些死难者多为重庆大武斗的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 196 人中，最多者是 20 岁以下，占 69 人，其次是 21—30 岁，占 66 人。年龄最小者 14 岁，最大者 60 岁。（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166 页）

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 299 位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占 176 人，其次是学生，占 104 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 82 人）。（出处同上）

在这片墓群中，埋葬死者最多的合葬墓莹，主要是工厂企业的，如生产枪支的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的墓莹埋葬有 31 位死者（其中有部分是该厂子弟校的中、小学生），生产坦克、装甲车的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墓莹埋葬有 37 位死者，生产国防钢材的一〇二钢厂（后更名特殊钢厂）二三〇七革命工人造反团的墓莹埋葬有 15 位死者，生产炮弹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的墓莹埋葬有 10 位死者，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墓莹埋葬有 16 位死者，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金属兵团的墓莹埋葬有 8 位死者……（陈晓文收集整理的《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2005 年 5 月 4 日在凯迪社区网站贴出，华夏知青论坛等网站转贴。2006 年 2 月 6 日被封）因此，将这片以产业工人及

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因红卫兵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而且，“红卫兵”又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它既指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各地党政领导仿效北京模式闻风而动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指各地向党政领导造反、夺权，后来有代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还指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在各中学一度取代原共青团组织的红卫兵（在小学则由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所以，笔者一直主张将这个地方称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简称“文革墓群”。

重庆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从 1967 年初即分裂为两大派，以后分别称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就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先是不准对方发表意见（“不准放毒”），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样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于是就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厮杀，最后就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重庆作为“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部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了大量常规兵器，其中有的是连当时的正规军都还没有配备，准备送到越南去支援打美国的。再加上当时的“支左”部队普遍对自己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抢夺武器采取“明抢暗送”的态度，于是两派各显神通，竞相抢夺国防企业成品库或部队军火库中的武器，有的还将国防企业的半成品武器组装、加工为成品，甚至自己生产武器（如重大八一五自制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得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不过这场“内战”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领袖，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在面对死亡时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呼喊着同样的“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因此这又是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

奇特内战。

因重庆大武斗时期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控制区，沙坪公园这片墓群中安葬的死难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或其亲属，因此在这片墓群的许多墓碑上都塑有象征“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个图案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在办报时设计的，因其简洁明快，便于绘制，后来就成为八一五派通用的象征图案。

这片墓群中的墓碑的样式，有的是模仿古代墓碑，有的则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墓碑上那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的造反派与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的思想渊源。不少墓碑上除了刻有文革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泽东为死于抗日战争或国、共两党内战中的革命烈士的题词，以及毛泽

东诗词中的名句，如“死难烈士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之类，套用的毛泽东题词，一般都是模仿的毛氏手迹。



(左图：一些墓碑上的革命口号在九十年代前期还清晰可辨。刘庆丰摄)

墓群中，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那座墓碑显得十分突出，这座多人合墓建成于大规模武斗暂时告一段落后的1967年10月，其碑文很有时代特色，全文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春华。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

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

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看环宇火样红。

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这大旗啊，我们高高举；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十月

这座墓中埋葬着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八位学生，均死于 1967 年武斗战火最炽烈的 8 月间，“八三”、“八四”、“八二二”三次武斗中。他们分别是——

张光耀，二十九中高三学生，该校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勤务员，1967 年 8 月 3 日，因两派在二十九中校内武斗，石油学校的八一五派有人中弹受伤躺在操场上，无人敢前去营救，石油校的几个女生跑到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团部求救，张光耀听了她们的哭求，转身就走，用他同学的话说，“活像到大操场去捡个篮球转来一样”（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1995 年第一期），走去就被对

方射杀。

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这六位学生，是 1967 年 8 月 4 日帮财贸八一五总部搬家时，在财贸俱乐部门口遭遇反到底派武斗队突袭被枪杀的，当时几个女生嘴里还在吮吸冰糕。女生中 14 岁的杨武惠，就是这片墓群全部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两人之一，遇难时只有 14 岁。

孙渝楼，二十九中高一学生，时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南岸区革联会代表，1967 年 8 月 22 日在反到底派攻打南岸上新街八一五派据点时，为掩护其它人撤退，只身断后，中弹身亡。

另一座单人墓，其墓碑上的文字是：

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虾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这篇墓文中，“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一语有些耸人听闻。其实这只是写碑文时的夸张、溢美之词。据知情者回忆，江丕嘉是重庆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高三学生，其父在重庆大学任教。1967 年 8 月 21 日晨，江丕嘉正奉命驻守在重庆市市中区的制高点枇杷山公园上。晨 6 时许，江北区的反到底派向这边开炮，其时，江丕嘉正背倚一棵树睡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而同倚此树的另一同学却毫发无伤。因江丕嘉出身名门，长得又十分英俊（私下有“美男子”之称），因此在他的追悼会上，班上的女同学们哭得最伤心。（《读者来信》，载《龙门阵》2006 年第七期）

中央调查组一行是在 1967 年 8 月 21 日 18 时抵达重庆的（从成都飞渝）。这时离江丕嘉身亡已经有约 12 个小时了。何况，中央调查组到重庆后一直住在鹅岭下边的五十四军军部，哪里需要你几个中学生跑到枇杷山公园上边去“保卫”？其实，无论是“保卫中央调查组”还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死难者都不过是文革祭坛上毫无意义的牺牲。

墓群中，有一座重庆第三中学高中学生艾淑全的墓，艾淑全是当时三中抗大兵团勤务组成员和武斗队负责人。墓碑上的文字是：

艾淑全烈士，男，河北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优秀共青团员，重庆三中抗大兵团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英勇牺牲，享年二十一岁。

艾淑全的一位女同学徐若丹（1968 年 7 月 16 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带头下嘉陵江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在日记中记下了艾淑全死后她的心情和他们在沙坪公园墓地埋葬艾淑全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下午睡觉起来，刚到红专楼门口就听见说艾淑全死了。我根本没往那儿想，还以为是别人骗我的。一会儿后，“打渔船”回来了，抬下了艾淑全的尸体，一个悲愤已极，向天连鸣数枪以致哀。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天晚上还好好地和我们谈天，谈论当前形势……

烈士遗体抬到会议室，人们都悲愤地低着头，站在旁边为他默哀。有的低低地哭泣，有轻轻的叹息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天在呼啸，地在动摇。大自然和战士的心灵正唱着一支悲壮的乐曲。我们冒着细雨在街上分头刷大标语：向李任死党讨还血债！

艾淑全烈士遗体躺在会议室桌上，他已换上了军装，手里拿着语录，还戴上

了主席像章、胸章和袖章。他眼睁着，嘴微张着，像在说：我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李任死党斗垮斗臭，就是死不瞑目。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昨晚一两点才睡。今早听说烈士家长来了，忙起身到兵团，才走拢，一阵悲愤的哭声传来，那是艾淑全烈士的妈妈、妹妹、爸爸、弟弟在哭。听到这凄悲的哭声，谁不动心流泪呀。艾淑全是我兵团负责人之一，又是革联会的专政委员会的常委，平常和同学玩得来，脸上总挂一丝笑容，同学都知道他工作踏实，认真积极负责。死了他，谁都觉得可惜。听说还要等他哥哥来才埋，这是最后一面哪！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艾淑全烈士的哥哥来了，他是天津大学的学生。他见了艾淑全烈士的遗体后，默哀了好久，摸了他，把自己的纪念章、袖章给他戴上了。这时，他爸爸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哥哥为了不让老人伤心，只背着老人流泪。看着这场面，谁不陪着掉泪呀！化悲痛为力量，一定得向李任死党讨还这笔血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昨天开了追悼会，烈士全家讲了话。烈士生前好友介绍了他生平。他很早就造反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打成反革命、暴徒、牛鬼蛇神，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压，那时他没屈服，为革命，四处奔波，他曾说过：“为了党，我愿献出一切。”现在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今天，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埋葬了烈士。烈士埋在沙坪公园，烈士墓里，我们向他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每人捧了一把泥沙，埋葬了烈士……

一个英雄倒下去，万杆红旗冲天起。英雄的死更多的唤起了受蒙蔽的群众，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愿将青春献给党。

（根据徐若丹日记原件录入，由徐若丹的妹妹、作家徐军提供）

当年可歌可泣，如今可悲可叹。这片墓群中的每一座墓里，都埋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墓群。

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

（右图：重大机械系 67 级机造四班部分同学 1968 年 11 月在重大“烈士陵园”碑下留影。黄肇炎提供）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当年的大规模武斗中共死亡 24 人，24 个风华正茂、热情单纯的大学生。1967 年大规模武斗结束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校园内的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墓前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 24 位“烈士”的名字，刻了仿毛泽东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陵园进口处还竖了很大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悼念亡妻杨开慧和故友柳直荀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当年许多八一五派的同学毕业离校时都会来到这“烈士陵园”凭吊并合影留念，表达对死难同学的缅怀之情，并相许今后要经常回到这里来祭奠不幸早夭的同学。然而，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座陵园就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被平毁了。那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经满怀豪情地“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

值得庆幸的是，沙坪公园内的这一处“烈士”墓群没有被毁。尽管多年来不时会有它将被拆毁的消息引起舆论的关注，但是它毕竟远离闹市，所处地段实在偏僻，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开发热潮中也很难让人看到开发价值，再加上墓群数



量大（上百座），安葬死者多（数百人），涉及家属亲友更多（其中既有事业成功人士也有下岗困难人群），因此开发商一般都不会去打这块地方的主意，免得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这片墓群的最后一批墓莹建成四十年之后，在 2009 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此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用了个不甚准确的“红卫兵墓园”的名称，但总算是将它正式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巴金老人呼吁多年而未能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实体性的“分馆”。

如今。这片墓群中的不少墓碑已经风化剥蚀，碑文字迹已经难于辨认。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和抢救已经刻不容缓。但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需要抢救的，还有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本刊特稿】

按：本文作者郑志胜，1943 年 1 月生，四川省达县人。1962 年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 67 级 1 班。文革前为该校学生中有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文革武斗中受学校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指派，负责处理武斗中该派死难者尸体，被同学们戏称“尸长”。1968 年底分配至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采油三厂工作。1969 年 7 月由工宣队领回重庆大学交待反省文革中武斗死人等问题。1970 年 6 月 26 日被正式逮捕。1979 年 11 月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以“指挥、参与、枪杀、打死”俘虏等罪名判刑 13 年。1983 年 6 月 25 日刑满释放后留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教育科工作。1998 年 1 月提前离岗。2003 年正式退休。前些年重庆电视台曾播出专题片《好人郑志胜》，介绍其退休后经常在公交车上不怕威胁见义勇为制止小偷扒窃乘客的事迹。

武斗“尸长”忏悔录

郑志胜

1967年7月3日，815派北碚“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的简称，是八一五派的武斗指挥机构）将周芳英、邓树荣（注：均为重纺五厂工人，八一五纺织兵团成员，在北碚两派武斗中被刺杀身亡，对方亦有死伤）等5具尸体送来重大，在民主湖畔防空洞内用甲醛浸泡展出后，由于处理方法不科学，尸体外部没有腐烂，内脏却腐败了。从伤口里冒出许多泡泡来，腹部胀得像大鼓。怎么办？重大815总团勤务员黄顺义想到了我这个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学雷锋标兵”。

7月7日，当我正准备离开学校回老家躲武斗的时候。与我同班的黄顺义（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和负责后勤的贺尔金来找到我。黄先夸了我一顿，说我学雷锋很出色，很得人心，是个好同志。又说，运动初期反对他们造反是由于对运动不理解，莫往心里去。然后才切入主题：希望我负责把周芳英等人的尸体处理安埋了。

当时人们还不知甲醛对人体的毒害，只知尸体又脏又臭，且甲醛气味刺激得眼泪、鼻涕四溢，难以忍受。正好有四个西师831的俘虏，总团交给我协助处理尸体，并许诺处理完了之后就放他们。受命于危难之时，我带着四个喽罗走马上任了。为此同学们给取了个绰号“殡葬连长”，以后又改称“尸长”。

我先去木工房联系做了几口棺材，再去沙坪坝百货公司购了一匹白布，然后去汉渝路药剂校旁边的四方井8号找到专门处理尸体的王银山（外号王老幺），当时他裹一具尸收费10元，像周芳英们这种腐尸是20元，穿衣10元，上下车10元。那时我们一个月生活费才12元呀！虽说处理尸体费用可以报销，但用着学校的钱我也心痛。我到校医室领了一捆口罩，一个人发一张。又领了两双长长的塑胶手套。俘虏们从池中将尸体一个接一个捞出来，冲冲水，再抹干。王老幺用白布裹好，再放入棺材，抬到二教学楼（全石料外墙的工学院）外的沿江马路坎下，挖了五个坑掩埋了。

说内心话，开初叫我去埋尸首，我是不乐意的。又脏又臭不说，即使我这样不信迷信不怕鬼的人，那背沟也感到麻酥酥的。特别是伏尔马林一熏，几天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啊！晚上我落泪了，谁叫我“家庭出身不好”（注：地主成份），

当了“狗崽子”，又鬼使神差，运动初期为了保校党委，保郑校长，那么起劲地反对黄顺义他们造反派呢？！……唉，更可悲的是后来，我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倘若我不去埋死尸，我这一生的自传就不似这般晦气了。

埋尸体的日子，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任劳任怨”。开初人们不认识我，只知处理尸体的是俘虏，815派的人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就虐待这些处理尸体的人。我为此挨了许多的脚尖和拳头。特别是当气愤的看众打俘虏时，我去劝阻，人们以为我在反抗，那脚尖拳头的力度更足，在我身上留下了斑斑驳驳青一块紫一块的纪念。

刚把周芳英等5具尸体埋好，长安厂包自成（注：在厂内两派武斗中被钢钎刺死）、二七总指挥部的李叶明和六中学生陈乐洲（注：李、陈二人在7月7日攻打二轻局大楼时被守楼的二轻兵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尸体又拉到重大来了。7月份大热天，尸体已开始变质，有点腐臭，必须早日入殓掩埋。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怎么办？我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坡上早已修了块墓地。那时沙坪公园门票只要两分钱。我经常去玩，偶然间发现的。里面原先埋着周总理的父亲和岳母，后来迁走了。以后有五座解放军烈士的坟墓建在第四个平台上。其余平台，是沙坪公园的苗圃。培育了许多桉树苗和香樟树苗。我向黄顺义建议，同“园林815”联系，利用现成的墓地安葬“815烈士”。黄顺义和我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头头何太福，把此想法告知，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那块墓地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他们是第一批安埋在此的“815烈士”。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起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西师831的几个学生俘虏，我只有食言，等到迁坟后才释放。

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恶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数十年，又流了许多汗、血和泪，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回首往事，不寒而栗。我不善文字，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更没有收集什么资料。只是凭我追悔莫及、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记忆，把在内心积郁

的情感，蘸着我几辈人的汗水、血水和泪水，以自传的形式写出来，让后人从中能悟出些许道理来。只要后代能免除吾辈的灾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7·25”工业校武斗事件（注：7月25日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克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工业学校，重庆两派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之后，重庆武斗连连升级，反到底首先抢占兵工厂，仗着武器精良大开杀戒。沙坪坝附近的杨家坪、江北地区的815派节节败退，抬着尸体和伤员到重大和师专避难。重大民主湖畔的防空洞就成了尸体的集散地。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从前线抬来，处理之后，又一批批地运至沙区公园小烈士墓掩埋。

第一批运来的，有8月2日至5日在建设厂清水池、弯弯大楼、三八宿舍等地死亡的重大301的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注：8月2日，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原订参与攻打建设机床厂以抢夺武器，因内应未弄清对方火力点而临时改变计划参加空气压缩机厂两派武斗，在坦克掩护下进攻对方据点时纵队长谢宗正与队员陈茂明、张显明3人身亡；董继平因钢盔被打掉，头部中弹重伤致残）。还有二十中（育才中学）初二女学生、13岁的梁自巧和机制校女学生、18岁的孙世玉（外号猴儿）。

协助我处理尸体的是“7.25”从工业校抓来，经审讯后扣留下来的俘虏，沙区交警六中队的何开泰，据有人揭发，他是工业校反到底的幕后策划人（即所谓的“黑高参”），而且在815派攻打工业校时用小口径步枪打死重大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的狙击手就是他；还有雷午生是工业校反到底的一号勤务员，此人家住小龙坎重庆传染病医院附近；夏绍伦是工业校反到底武斗队队长；另一个王槐定是搞宣传的。7月26日释放工业校俘虏时留下来的十来个人，除这四人外都先后释放了。这四个人就是我处理尸体的第一批“专职”帮手（处理周芳英等人尸体的西师831那几位同学除外）。重大校内302治安部队派了两人专门协助我晚上看管他们。囚室在学生二宿舍底楼旁一宿舍那头第一间。白天由我支配，吃饭由我去饶家院武斗队食堂领取。

二十中死难学生梁自巧，生前我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告诉我们，她生活

得很开心，很幸福。她时常来我们班，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年龄虽小，却是二十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尸体抬来，我愣住了：“这不是前两天还见过的小梁妹儿嘛，怎么就牺牲了！”送尸体来的人告诉我，她是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牺牲的。他父亲梁大高是建设厂工人，梁自巧是他最心爱的唯一的女儿。

梁自巧是我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由于她很胖，在大腿和小腹下面腹股沟划开皮肤找股动脉时，皮下脂肪足有一寸厚。我开初把针头插进那“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射出来溅到我右眼里，我眼睛感到一阵剧痛。赶紧叫何开泰、雷午生把我扶到附近洗澡堂用清水冲。过了许久，虽然眼睛没有灼痛感，但右眼什么也看不清了。医生殷德军赶来，才知那“股动脉”是一条神经。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在那腹股沟里，股动脉跳动的地方有三根管状物。上面一条白色的，实心，是神经；第二条，也是白色的、中空的，那才是股动脉血管。因为人死时心脏慢慢停止跳动，血压不进动脉管，留在静脉血管和心脏里。底下那根殷红发黑的是静脉血管，里面充满了血液。殷医生给我洗了眼，上了药，贴了一块纱布。我用一只左眼继续为自巧输“伏尔马林”。输完了把她尸体放到水槽中，注入水，加了点苯酚（石炭酸）。

第二天她父亲梁大高赶来，我伸手到水槽中抓着她的裤腰带提到水面让他看，他老泪纵横，哭得死去活来，脑袋往水槽上撞。围观者也为之动容，跟着哭……

机校死难女生孙世玉，1.65米的个子，很清瘦，肌肉长得跟男孩子一样，据说是校女篮运动员，因为她姓孙，且又瘦，因此得了个绰号“猴儿”。她是815派失守杨家坪往沙坪坝撤退时，被反到底射杀的。给她注射甲醛时我有了经验，输得很顺利。孙的尸体没有浸泡，我给她裹了尸，穿了一套机制校武斗队穿的红色运动衫，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工整，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她亲人来看了才入殓。梁、孙二人的尸体入殓后，由她们各自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重大301（注：在校外作战的武斗队）的谢宗正等人，安葬在学校后门外松林坡顶草坪里。没有像唐世轩、张全兴的尸体那样在图书馆设灵堂，让人凭吊。

机校的同学来掩埋孙世玉时，诡秘地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撤退时在卫校（机制校和卫校当时都在袁家岗）将关押的七个反到底派俘虏全部枪毙了。后来去看，

少了个女的，地下血迹拖了很远。很久以后听说那个姓王的女生逃到了成都。得到刘结挺的重用，安插在省革筹中一个部门，还写了一篇什么文章，揭露 815 罪行。

两天后，重大同学刘文举（注：机械系四年级机造二班学生，在空压厂武斗中大腿中弹后失血过多身亡；一说为医生在抢救时输错药剂致死）的尸体抬回来了。他死于途中，还没有僵硬。我给他输了甲醛，裹了尸，穿了一套军装，扎了腰带，戴了军帽和红卫兵袖章。他是北碚天府煤矿人。父亲是矿工，根据家属要求，他没有埋在松林坡，而是运回老家天府煤矿。父亲、母亲和妹妹来接的他。他父亲说：“家里很穷，文举生前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他走了一定要照个全家福作纪念。”人都死了，这点要求算什么？我亲自把全家送到沙坪坝双巷子照相馆里，把刘的尸体推站起来，我抓着他的腰带躲在后面，稳住尸体保持站姿，他的父母分站两边，妹妹站前面，咔嚓一声，灯光一闪，照了个“全家福”。照片是我去取回校交给刘文举班上的同学给他父母送去的。照片中的刘文举栩栩如生，挺有“红卫兵”气质。后来相馆摄影师在沙坪坝碰到我，对我好生埋怨说：从那以后有些顾客听说有死人来照过像，都不敢来照像了，对他们的营业很有影响。我说：“当时你啷个不反对呀？！你若反对，我肯定就不会这么办了。”他说：“你们当时背着枪，我敢说半个不字！”我说：“你太不了解我们重大学生了，我们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从来不会强人所难。”我们两人相视一笑，也算过去了。

杨家坪、潘家坪、重医一线战事吃紧，815 在石桥铺、平顶山一带云集支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小龙坎交通机械厂青工曹龙生（因他出生于小龙坎，故父亲为他取此名）是反到底派观点。原在部队当兵时，是机枪手。他女朋友袁如颖是双碑二钢工人。他们认为沙区不安全，想跑到杨家坪袁如颖一个姨妈家去躲一阵子，此时杨家坪已是反到底的天下了。走至石桥铺白马凼时，几个 815 派荷枪实弹的人喝道：“口令！”他们怎么会知道口令呢？自然答不上来。815 的就认为他们是反到底的奸细，立即端着枪逼过来。这姓曹的当过兵，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一手，把那对着他的枪管一拉，这就惹大祸了！其余 815 战斗队员以为他抢枪，一涌而上，把两人抓住捆了个结结实实。在石桥铺临时指挥部里拷问时，拳打脚踢，还用烟头烧袁如颖的乳头。最后和前线拉回来的尸体一道，送到我们停尸房

来。

那一天尸体特别多，看热闹的人也多。有些死者的亲人、朋友、同事都在场。听说在战场上抓来两个“砸匪”（注：八一五派对反到底派的蔑称，因反到底派原称砸派）的密探，而且男子还是机枪手，好不气愤，就对曹龙生乱踢乱打，把袁如颖弄来跪起给尸体驱苍蝇，很耽误我的工作，拦都拦不住。八、九具尸体同时送来，输液包裹都搞不赢，中午 12 点了，午饭都忙得顾不上吃，而且棺材也不够。中途我要去重大木工房催做棺材，又怕我的“助手”——俘虏们趁机逃跑，怎么办呢？我顺手从一个送尸体来的武斗人员手中借来一枝半自动步枪，压上子弹，对空鸣了一枪后说：“我有点事离开一会就回来，你们不要跑，要跑跑不赢子弹哟！”谁料这一枪竟把停尸房上的一根电灯线打断了，停尸房里顿时一片漆黑。我找人去通知电工接线后，就去了木工房。回来后又为一个尸体换了针，已是下午 1 点过。我才去饶家院为俘虏们取饭。不知为什么曹龙生不吃饭，而且脸色很难看。我以为他中暑了，叫他去洞子里休息，给他打了一蛊开水。我就和俘虏们一起吃了中饭又开干。

一直忙到晚上 7 点过才结束。此时我才想起曹龙生，进去叫他回宿舍，我再去取晚饭。哪知他已死在停尸房里了。后来叫校医兰相臣来验尸，发现他额头上有个胡豆米大小的洞。用镊子进去一探，居然夹出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的弹头来！后来我才知道：据沙区红旗饭店内部的人揭发，在我离开停尸房后，该店青工彭大富叫俘虏们跪成一排，用小口径步枪开枪威胁他们取乐。枪肯定不是对着人打的，那么近距离开枪会当场死亡的。而且也不可能只打进头皮几公分。况且是在背后开枪，弹头怎么会从前面进入额头呢！也许是弹头打到防空洞石壁上反弹过来造成的。为此彭大富在沙区看守所关押，判了 3 年刑。

曹死后是他弟弟曹渝生来领的尸，其弟在 54 军当兵。来时首长吩咐他，不要找重大同学闹，相信问题是会调查清楚的。看得出来，曹渝生忍受了多么大的悲痛。还有那个袁如颖，这一生，回忆那两天的遭遇，也许是恶梦惊魂。也许不会流泪，泪水早已流干了。

帮我处理尸体的俘虏中，何开泰是跟随我最久的一个。从 8 月初开始，直到 9 月份他逃离虎口。他在重大整整两个多月，所受的折磨罄竹难书。皆因为那篇说唐世轩是他开枪打死的揭发材料。

唐世轩，重大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是 815 的摄影记者。从 815 揭竿而起到他 1967 年 7 月 25 日死于工业校时，许多照片都是他和学校宣传部门摄影师廖老师的杰作。唐是独子，家住建设厂民主三村一栋五户联住的平房，与“八一兵团” 6 月 23 日死于重医附小的余成英是邻居。余是在他影响下成为铁杆 815 的。唐世轩的父亲唐元浩，建设机床厂总装车间老工人。少年时就在绥定（现达州）军阀刘存厚所办兵工厂当工人，用土法造枪，技术精湛，解放后是建设厂第一批技术骨干。中年时与丧偶且育有一女的邓宗美结婚。

独子去世又不能再育，老两口好不伤心，终日以泪洗面。他们迁怒于何开泰。而且要命的是杨家坪失守后，唐世轩所在班同学把唐伯和唐妈接来重大照顾，也住在二舍。何开泰裹尸上、下班都得从唐伯、唐妈住处路过。唐妈经常在世轩同学面前哭泣。这样何开泰免不了经常遭毒打。锄把、扁担扫在他腰上、腿上，走路总是拖着伤腿蹒跚而行。何开泰是我处理尸体的得力帮手，他受了伤对我很不利，因此我总是尽力婉转地保护他。每次，唐妈总是抓着我又哭又闹，说我“故我不分，资产阶级人性论”。

为了鼓励俘虏们为我卖力，我经常偷偷地给他们弄些好吃的，是当时“难民”们也难于吃到的。其实是在饶家院 301 武斗队食堂捡些 301 战士们没有吃完的肉类菜肴拼凑起来的。唐妈看见了，也要哭闹。我只好把肉类菜肴埋在饭盆底下，并叮嘱他们吃饭时尽量避开唐妈。有一次露了馅，唐妈大骂我一顿，并向 301 后勤部长陈捷（外号骚部长。因他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告了我一状。陈捷在二、三舍之间“余国华讲台”（注：文革初期重大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余国华在三舍前一石台上发表“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反党黑帮”的演讲，后该处被同学们戏称为余国华讲台）处碰见我，用驳壳枪点着我胸口说：“尸长，你啷个搞起的，使唐妈哭哭兮兮的，你以后小心点，不要使烈士家属呕气。今后要改正，不可对俘虏太仁慈，否则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语气，倘若我当时不靠裹尸炼出了点胆量，肯定会被吓瘫在地。

从那以后，我照顾我的“帮手”们更隐秘了。盐茶鸡蛋只有藏在衣袋里揣回来让他们躲在旯旮里吃。夏绍伦因为是工业校反到底的武斗队长，遭的打也不少。特别是 301 的在战场死了人，尸体抬回校的时候，有些上战场打活老虎没有勇气，

派性又挺强的人，只有在死老虎身上出气。夏是个挺有骨气的人，每次遭打不躲闪，从不哼一声。我在猜想他心里一定充满了仇恨。

没几天，不知是谁又给我送来两个俘虏，是猫儿石重庆造纸厂（文革时叫“永红造纸厂”）两名反到底“干将”钱某某和蒋某某。我努力回忆他们的名字，没有成功，毕竟时间太久了。反正姓氏还记得。是两个近 50 岁的人。恰恰当天，二十九中送来九具腐败不堪，尸水横溢的尸体。是一车赤手空拳，仅拿着《毛主席语录》的“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宣传队的娃娃们，加上一个重大同学苏玉发，两个财贸的，正在帮财贸 815 总部搬家，被反到底武斗队开枪射杀。最小的一个女生杨武惠，8 月 4 日死前一天刚满 14 岁。他们死后好几天才转送来重大。那些尸体已腐烂不堪，不能注射甲醛了，下车后立即用白绸包裹入殓。当天下午就送去沙区公园埋了。是我亲自调的车，亲自押俘虏去埋的。

我是“尸长”，主要任务是收尸，并不负责关押俘虏。我用的俘虏是有限的。视尸体多少而定。一天有人送来两个俘虏，我没有要，叫他们押走，另外找地方关押。我见 302 部队的 M 跟押俘虏来的人说了些什么后，亲自把那两个俘虏捆起来，交来人押走了。武斗时期，这种事多如牛毛，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我进了沙区看守所，结交了一个狱友，他是新桥重庆铝制品厂供销科长姚福祥。1968 年我搞毛主席像章到他厂里去加工铝板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在看守所相见，自然得到已在劳动班劳动的他许多照顾。后来我也到了劳动班，与他朝夕相处。问他为什么蹲看守所。他说武斗时在战场上枪毙了两个俘虏。这种事武斗时司空见惯。我仍然没有往心里去。直到 1980 年对我判刑时，念判决书，把我毫不知情的死人划到我账上。我仍然如坠五里雾中。对法官大吵大闹，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在省二监狱服刑期满，留在监狱教育科工作。有事去六大队，有个叫戴志贤的犯人拉着我道歉说：“尸长，我对不起你！”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遂问他：“啥子事对不起我？”他说：“那次我送两个俘虏到重大来你没有收，你们重大有个背枪的同学把那两人捆起来叫我弄到战场上去放了，在背后放冷枪就枪毙了。后来清理此案时，我就咬定了你。现在我很后悔，不该冤枉你。如果你要翻案，我给你作证明。和我一起投改的旦维良也可以作证……”啊，原来如此！

302 部队 M 同学是个好同学，毕业后在重庆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工作，因工作出色，提升为处长。

枪毙那两个俘虏的姚福祥，东北辽宁人，共产党员，真资格的老革命。16岁参加革命，是54军蓝亦农政委的警卫员。当时蓝是团长。他曾冒死到敌占区去接蓝亦农的妻子，让蓝夫妻团聚。他跟蓝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打到四川来。因文化知识不足，后转业到地方，在重庆铝制品厂任科长。他灾荒年害肿病，去找蓝亦农，部队上虽粮食定量高一点，但粮票也不多。蓝告诉他，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绝对不可以超越群众多吃多占，考虑到他是个大汉，粮不够吃，蓝叫妻子把节约的粮票全部给了他。他对54军有这份感情，自然派性就足了。他身材魁梧，虎臂熊腰，近一米八的块头，为人耿介，人称“姚大炮”，家住陈家湾。后来他被判刑5年，仍回铝制品厂工作。唉！该死的“文攻武卫”害了多少好同志啊！

法庭宣判时，我对横空飞来的那两条人命罪拒绝签字，决心上诉。后来，与我要好的沙区看守所民警谭礼轩劝我：“崽儿，你上诉有屁用，老实告诉你，你们文革的案子是市政法党组定的板，法院只是完成个手续，你不要跟法院的同志吵，凭你承认的那两条人命，判你13年也不冤，你就算把这两条命说脱了，照样判你13年，何苦呢……”我没有上诉，结果一月后裁定下来，说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等六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具体情节一点没有，寥寥数行字，结了案。当时裁定书上的签字审判长是某庭庭长王旭，他后来是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退休后赋闲在家，我和我的同事王连辉去拜访过他，他说他知道我，因为许多问题存在疑点，市政法党组虽把案子结在我头上，但量刑时是酌情考虑了的。我还去申辩什么呢，比起那些死去的人，幸运得很，知足了。

由于我一直认为这两个死者与我没有关系，所以我竟把他们的名字遗忘了。我又没有判决书（我拒收了，没有签字）。我又不打算翻案，裁定书在辗转搬家过程中亦已遗失。只记得其中一个姓王。是何方人氏，不得而知。我只能感到遗憾。

8月18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让重大302部队的J押下来三个人。此J高高的个子，校篮球队队员，文革初期与我一样，保校党委的急先锋。也许与我一样，对郑校长遭受不白之冤含恨而死不满，参加了815，把矛头对准了迫害郑校长的工作组，进而炮轰市委，打倒任白戈，成为815的钢杆。押下来的这三

个人，有嘉陵煤矿的青工李平正、何明贵，还有重纺五厂的蔡万诚。据北碚“捍红总部”的材料说，此三人都是“猛虎团”（注：反到底派在北碚区的武斗队）的得力干将。当时是上午 10 点钟左右，在停尸房 J 把此三人及几页材料交给了我。这一天 815 派在河运校、潘家坪，重医一线与反到底激战，出师不利，拉来停尸房的尸体特别多。看热闹的难民、死者家属，沙坪坝的群众也特别多，不乏派性已达到顶点的人。我从 7 月 1 日重纺五厂周芳英、邓树荣及四川外语学院我的老乡王崇杰等人死后，就很仇恨“猛虎团”。甚至狂想过：有朝一日遇到“猛虎团”团长邱开全，打不赢就用一颗手榴弹与他抱在一起同归于尽，为死者报仇。

我浏览了一下材料后就问蒙着双眼的李平正、何明贵是否是“猛虎团”的？他们都回答说：“是。”我又问是否杀死过 815 的人（材料上记录杀了 815 几个人）？他们也回答：“杀过。”而且说：“我有罪，我交待，我坦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不得而知，但他俩的确是这么说的。与材料上记录的毫无二致。我又问蔡万诚，他眼睛也是蒙着的，大呼冤枉说：“我根本不是猛虎团的，是因为与捍红总部头头某某某有过节，他冤枉我的。”而且还说他有个嫂嫂某某某是重大 815 工人分团的。因此在愤怒的群众痛打“猛虎团”的时候，我拼命地保护蔡万诚，背上还挨了几拳头。而对李平正、何明贵二人，我不但放任围观者打，还煽动说：“那两个是‘猛虎团’的，我不管。”可想而知，我这句话无异于借刀杀人。群众于是围着李、何二人乱打一气。李、何二人蜷曲在地上，被人乱踢乱踩，渐渐地呻吟之声也微弱了。我解了些气，把此二人关进了一个空着的防空洞。有些“二杆子”还用碗口大的石头从窗子外往里面砸。

我已把蔡万诚的蒙眼布解开，找人去把他嫂嫂叫来。他嫂嫂的确是重大木工房的工人，我做棺材还去找过她。她告诉我，他丈夫这个弟弟蔡三虽是反到底的，但绝非“猛虎团”成员。于是我收留了他，让他与何开泰等一起处理尸体。

中饭后，李、何二人躺在防空洞里已重度昏迷。我怕死在洞子里不好交待，托人从校医室搞来两副担架，找来一辆车，于下午 3 时许拉到了中渡口二工人医院（现肿瘤医院）。拉去医院这件事，被长安厂唐朝全（外号机大爷）知道了。他十分气愤，在停尸房找到我闹。此唐是我当“尸长”时的一个马仔，帮我做了不少事。他在我面前撒点野，我一般都要迁就他。他把枪栓拉得哗啦响，而且对空鸣了一枪后说：“你们重大太不像话了，群众打了两个‘猛虎团’的，还拉到

医院去抢救，比对我们这些逃难的还好。我姐姐是被反到底打死的，我要报仇，老子撵到二工人医院去，把那两个嘣了……”我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他的情绪，从根本上讲，我也想把那两人搞死，为我们的死者报仇，只是自己没有那个勇气罢了，就说：“机大爷，莫闹莫闹，这两人伤那么重，已奄奄一息了，活不了多久的。倘若你非要亲自搞死他俩也不难，晚饭后你找两个人到停尸房来，让你亲自搞定他俩行不？”唐说：“那还差不多。”

尸体处理毕，全入殓了。只等第二天拉去沙区公园掩埋。晚饭后我带着唐朝全等人去饶家院找到陈捷，我说：“兄弟伙，你不是要我搞死几个俘虏，为 815 死难烈士报仇吗？现在机会来了。请你给我一支手枪，给几颗子弹。”陈捷高兴极了。给了一支 54 式手枪，7 发子弹。唐朝全带着长安厂 17 车间的冯治国，石桥铺中学的廖承平（17 岁，外号“尿包”），他们都是到重大避难的，住串联大楼，他们在饶家院大门口等我。我又去重大车队调了一个敞篷车，司机唐某某（中年人，家住重大后校门中渡口）。唐朝全等三人上了车，我坐司机台，把车开到二工人医院。一问，下午抬去的李、何二人仍在急救室昏迷不醒，仍然是躺在那两副担架上。我和唐朝全等商量：“借转西南医院继续抢救为名，把李、何二人在转院途中搞定，以我招手为号开始行动。”我们四人，七手八脚把李、何二人抬上车，司机唐某某在我指挥下，把车向西南医院开去。车过天星桥，到覃家岗，我向车上招手。唐、冯一人一个，用枪托猛击李、何二人头部。廖承平没有见过这个阵仗，未动手。我怕他们致命的时间不够，叫司机把车开到凤鸣山桥上才调头到西南医院。我下车去急诊室对医生说：“有两个猛虎团的俘虏被群众打得半死，请你们收治。”那医生是“七医大红总”的。他说：“815 的伤员都无床位住，猛虎团的让他死了算了！”我当时估计那李、何二人必死无疑，只是想他们死在医院，事后好交待，搞个“金蝉脱壳”。过了 20 分钟，在我一再要求下，医生拿了电筒和听诊器爬到车上检查，那两人瞳孔放大，停止呼吸多时了。我金蝉脱壳失败了，只有硬着头皮往回拉。

车到覃家岗，后面跟来一辆武装车，用灯光向我们发信号，我临时调来的车，司机唐某某根本不知当晚信号是什么。那车以为我们是反到底的，向我们开枪。唐朝全回来坐的司机台，二唐把头埋得低低的，加足马力经师专向重大校门疾驶。我和冯治国、廖承平在车上，把李、何二人的尸体重起来作掩体、趴在车上，任

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我把 54 手枪推上膛，对空断断续续开了四枪。明知来车是本派的，鸣枪的目的只是想让来车知道，我们这个车上也有家伙。此一着的确奏效，追的车过了天星桥见我们朝师专方向开，也就没追了。

车到重大串联大楼，见门口有许多人。原来是江北的反到底用三七高炮炮击六教学大楼和串联大楼，大楼里的人只好到大门外坝子里躲避。我和唐朝全、冯治国、廖承平，两个人拖一个尸体，一人一只手往沿江马路二教学楼外原来埋周芳英等挖那坑里甩。当晚没有掩埋，因对岸炮弹那么密集，怕挨炮。只见江北射来的三七炮弹的曳光从空中划着微微的弧线闪着亮光向重大一串串地飞来。先是江北传来炮弹出膛时嘭、嘭、嘭的声音，继而又听见六教学大楼传来炮弹击中楼房时的嚓嚓嚓的声响。那一晚，比现在节假日放焰火要刺激人得多，精彩得多。

第二天，有人来对我说：“尸长，工学院外面有两具死尸。”我才赶忙叫建设厂在重大避难的老班长辛继伦和游自高去刨些土掩埋了。这就是我一生追悔莫及，愧疚一辈子的两条人命呀！我虽然为他们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我毕竟还活着，晚年还幸福。他们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而且是我的罪过。

在沙区白鹤岭 5 号看守所羁押的日子，我经常思念我的年迈的母亲、含辛茹苦培养我的大哥、我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常常想到李、何二人的亲人，他们的父母，如果结过婚有了孩子，孩子们好可怜！我为自己的亲人和他俩的亲人流了不少泪。我刑满出狱后，曾有过奉还尸骨，向他们亲人负荆请罪的初衷。我去重大拜会了当年校团委书记，被工作组打成重大“三家村”黑帮、倍受迫害的刘稚民，向他倾吐了我的想法。已平反恢复工作的刘说：“小郑，你已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了代价。现在他们的亲人经过这么多年，思想已平静了，你这样做又会使他们再度陷入痛苦的。如果他们有子女，子报父仇，没完没了地纠缠你怎么办？而且你也要给我们学校带来麻烦的。只要你有这份心，也就够了……”

我静心思量，不无道理，也就打消了背还尸骨、负荆请罪的念头。我每次回重大，都要到埋李、何二人的地方去站许久。想到自己年轻时的罪过，老泪纵横。最近又去时，那儿已修了房舍，也不知李、何二人的尸骨抛向何处。我连他俩多大年龄，像什么模样都没有看清，一时气愤，酿成这难忘的罪孽。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我的死能换回他俩的生命，我宁愿去死。只有这样，才能免除我无穷无尽的自责。我将把对他俩的忏悔埋在心里，假若真有阴曹地府，来年相逢时，再负荆

请罪吧！

8月19日，我刚收工把俘虏们带回二舍，重大“公安部”部长许洪凯（外号许大马棒）来找到我说：“有个长安厂‘六月天兵’（长安厂反到底武斗队）的，在九舍审讯时，兄弟伙整过了火，翘杆了（死了），要想法把尸体料理一下。”那一天，战场上死的人多，棺材不够用，我又想到头一天，埋李、何二人的尸体处还有几个坑。于是叫许找几个人。把那尸体从九舍抬下楼，用板板车拉到二教学楼外。我发现，此“六月天兵”虽已停止呼吸，瞳孔已放大了，但尸体还有一点温度，没有僵硬。我怕以后有活埋之嫌，从板板车上放下来后，没有立即掩埋，等了半个小时去检查，尸体已冷僵了，背部出现了尸斑，差不多了。就和另两位拉尸体来的同学把他掩埋了。听说此人是18日江北反到底炮击重大时，在松林坡抓到的。甚至还说他正在给对岸打信号弹云云。但究竟为什么，我不知道，叫我埋就埋。此案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交待过。没有苦主，谁提起他，也许又是一条冤魂吧。

8月20日傍晚，我们还没有下班，许洪凯又来找到我。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对我说：那几个崽儿又捆死了一个人。这个人不好办，是重大学生食堂的炊事工刘平治，许多人都认得，传出去影响不好。要我想办法秘密处理了。我说：让我想想。我叫俘虏们抓紧时间把当天送来的几具尸体处理完毕，入了殓，只等死者单位第二天派车来拉到沙坪公园安葬。给俘虏们打来晚饭，我将就与他们一起草草吃了点后，赶到九舍二楼，找到许洪凯。

我一看，地上躺着的死尸，好大的块头，起码在180斤以上。虽是本校炊事工，但不是我们电机系食堂的，不认识。手一探鼻息没气。掰开紧闭的眼皮，瞳孔已放大，把背翻过来，有尸斑。他的确已死了。我对许说：“快调外单位给301开武斗车的司机开辆车来，再派人去校医室借副担架，趁天黑，说此人没有死，拉到二工人医院去抢救。到汉渝路，往沙坪坝转一圈，说是外单位‘八一兵团’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从大校们拉到停尸房去马上装棺材。我那儿正好剩了口棺材。明天当烈士埋到沙坪公园去。”

许认为可行，照办了。拉到二工人医院“抢救”的人，转一圈回来，变成了“八一兵团”的“烈士”。我和许（不准外人插手）把“烈士”装进棺材，用铁钉钉了个严严实实，只等第二天送去沙坪公园安葬。

我和许松叹了口气，各自回寝室休息，抄民主湖边小卖部香樟林那条小路，走到三舍、四舍间，碰见了陈捷。许便与陈谈话。头头们交谈，我不便凑趣儿，仍径直向前走，想赶回寝室休息。走出 40 多米就被陈捷喊住：“尸长，回来，回来，你还有任务！”我只有回去，在三、四舍路边条石上坐下等“任务”。

许、陈二人继续交谈。此时 301 冶金系 37 纵队头头唐知非、叶德明（外号“叶杀”）路过，也被陈捷叫住，陈捷不知向他们吩咐了些什么。一会儿，来了十来个荷枪实弹的人。陈捷对我说：“有个和刘平治一起抓到的，刘死了，他活着，事情暴露了不好办，一会儿我找人把他处理了，你想法把尸体摆平。”

在这一群杀气腾腾，刚刚从王家大山吃了败仗（注：重大八一五 301 武斗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 8 人，伤 7 人，是重大八一五在武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背回几具尸体，肝火正旺的人面前，我敢说什么呢？

那个眼睛被毛巾蒙着从九舍押下来的小个子，后来得知叫陈汝福，是死者刘平治的妻侄儿。江北县仁和人，正与刘平治在重庆电机厂工作的女儿刘朝凤耍朋友（谈恋爱）。武斗一开始全家去江北县陈汝福家避难。那时一家人去亲戚家，吃饭的开销太大，带去的钱早花光了。于是刘平治冒险带着陈汝福回重大拿钱，供全家人在江北开支。回沙坪坝容易返江北难呀。那几天江北反到底炮轰重大，两派以嘉陵江为界炮火连天。交通完全中断。刘平治急于赶回江北，一家人等着拿钱回去用呀！两人一个找了根竹筒，想泅渡嘉陵江到江北。谁知南岸这边红岩玻璃厂 815 派有巡逻队。把两个欲渡河的人抓住。一审讯是重大的，重大的为什么往江北跑？说不清。捆起来交重大自己去理抹（川语：审查、处理）吧。于是红岩玻璃厂的武卫人员把刘平治二人交给了重大 815 工人分团头头邢玉章。刘平治运动初期参加了“工纠”（注：官办的保卫党委、打击“牛鬼蛇神”和造反派的“工人纠察队”），邢玉章是地道的 815，两人有过节很自然。但邢玉章并没有折磨刘、陈二人。只是照玻璃厂来人说的：“刘平治在河边给江北反到底发信号，指点炮轰目标，任务完成了，想过河。”想到刘平治早不回来，迟不回来，一回来江北就炮轰重大，而且打得那么准，现在不打炮了，他就走……刘、陈肯定不会承认。

重大“公安部长”许洪凯只有吩咐手下拷问，谁知用刑过重，刘死了……我无心去推断、考证以上说法的真伪。

几个人把陈汝福押下来，叶德明派人把民主湖戒了严后，押到停尸房一个防空洞里。我听陈捷说：“小崽儿开枪！”一声半自动步枪的响声之后，陈汝福倒在洞子里。陈捷又用 54 式手枪向蜷曲着的陈汝福开了一枪。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小崽儿”的面容，事后，我好奇地去冶金系借故找“小崽儿”。想看看他是什么模样。结果认识了一年级的胖胖的，圆圆脸蛋的“小崽儿”罗某某。而实际开枪的“小崽儿”是苏子弟。此“小崽儿”至今我不认识，只知他为这一枪被判了七年刑。

事毕已是深夜，叶德明带着他那一帮兄弟走了。陈捷也扬长而去。民主湖一片寂静，重大实行“战时灯火管制”，漆黑一片。借着手电筒的光柱，我和许洪凯撬开装刘平治的棺材，把陈汝福的尸体颠倒放入棺内，加了几颗钉子，更严实地钉上了。然后用洗尸体的水管子，把洞内的血迹冲得干干净净，再用帚帕拖了一遍。下细（川语：仔细）用电筒照了又照，不让留下一丝血迹——但还是百密一疏，墙上的弹孔还清晰可见。我后来回校反省，指认现场，办案人员将墙上弹孔照了像，以作罪证。

（下图：郑志胜 1983 年刑满出狱后到沙坪公园墓地留影。）



第二天，我们把头天处理的尸体，包括刘平治、陈汝福合装的那口棺材一起抬上车去沙坪公园安葬。每口棺材上都写有“烈士”的单位和姓名。我胡乱编了个名字和单位写在刘、陈二人的合装棺上。但有区别：除这口棺材是钉严的，其余棺材都没钉严，以便“烈士”家属在下葬时揭开盖子看最后一眼。车到沙坪公园差点露了马脚。我那几个俘虏抬刘、陈合装棺材时，何开泰说：“哎，今天这个烈士啷个这么重哟！”我正感惶恐，永红造纸厂那个钱老头说：“背时的莫乱说，死人越说重就越重啊！”大家无话，我舒了一口气。

那些“烈士”有家属，有同事，开棺看最后一眼，哭泣宣誓，鸣枪致哀，热闹非凡。我这个“烈士”却没有人送。为了掩人耳目，我借来一支半自动步枪，要了三夹子弹。对空鸣了二十七枪。口中说：“某某某烈士，你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出了你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15战士永远怀念你！”而且向新垒的坟头深深地三鞠躬。

那个“烈士”是够沉的。刘平治起码180斤，炊事员嘛，个头也大。陈汝福虽个子小，100斤还是有的，装在一起怎么会不沉呢？好在俘虏们再也没议论“死人越抬越重”的蹊跷事，事情总算过去了。

但还是没有过去。武斗平息了，刘平治的家属要回来。刘平治是由工人分团邢玉章交给许洪凯的。人弄不在了，咋交待？许又来找到我，好生埋怨：“尸长，都是你的馊主意，把两个死人装在一口棺材里。刘平治的家属要回来了。问起刘平治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陈崽儿可以说放走了，失踪了。武斗期间不明不白失踪的人多得很，还好说。而刘平治是工人分团交给我的，舆论又是送二工人医院了，怎么交待哟！”

我冥思苦想，嗨！有了。第二天，我备了口棺材，带着何开泰等抬到工学院外马路边，将那位“六月天兵”掏出来装了棺，抬到后校门往药剂校后门那条支路边一块菜地里，挖一个坑埋了。冒充刘平治的尸体。不几天，刘平治妻子带着女儿刘朝凤和12岁的儿子回来了。根据许洪凯的安排，我在后校门外柏树林，重大家属区一栋破旧不堪的平房里，找到了刘平治的妻子。我说：“刘平治被外单位的人打了，送二工人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是我收的尸埋在后校门外去药剂校后门支马路的菜地里。”我从内心讲，感到刘平治一家挺可怜的。妻子没有工作，又有哮喘。女儿朝凤虽已工作，但工资低，儿子还那么小，更主要的，我了解刘死的内幕，他死得太惨太冤了。出于派性，为了815的名誉，我不能说实话，但心里在流血啊！我在编故事愚弄一个多病的、苦命的、老实巴交的老大娘啊！特别是孤儿寡母哭成一团，家里没有了顶梁柱，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真的跟着哭了。我身上还有50多斤粮票，全部掏出来给了刘妈。又找许洪凯要了50元钱，以我的名义给了刘妈。刘妈自然感激我，我的话她基本上相信了。只是那座坟墓刘朝凤去看了，她表示怀疑。事后我又常去刘家，多少给点资助。刘平治的儿子还叫了我郑哥。邻居们居然认为我在与刘朝凤要朋友。

许洪凯又对我说：“尸长，两个死人埋一口棺材，天长日久，会败露的哟！”我又想起 7 月份中梁山武斗拉回来那具河运校航锋崽儿的尸体埋在沙坪公园里的。于是通知河运校的来领尸。当那死者的同学来领尸时，我把陈汝福的尸骨叫河运校的人取走，河运校航锋拿去当他们的“烈士”埋在学校里了。

俗话说：“没有三年不漏的茅草房。”“纸是包不住火的。”刘平治、陈汝福案件终于摆上清查案卷，是陈捷最先交待的。我被关进沙区看守所后，中途重大把回光文、陈捷、魏运福和我押回重大松林坡礼堂批斗，结束后上车押回看守所时，他们聪明些站到了中间，我笨头笨脑地站在边上。刘朝凤手抓一根 400 厘米长 3 厘米粗的铁质水管，踏上卡车踏板，狠狠一水管打在我头上。顿时肿起鸡蛋大一个包。一阵昏眩，差点晕倒过去。我内心在流血呀：“朝凤呀，冤有头，债有主，我冤呀。但我不怨你，你失去了父亲和未婚夫，母亲在父亲死后哮喘病日益严重，已卧床不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压在你一个年仅 20 零点的弱女子身上，多难呀！你要发泄就发泄吧。如果我头上这个包能使你心里好受些，我就算从另一个角度来安慰你了……”

朝凤，不知你现在还明不明白你父亲和表哥怎么死的。你也不知道，我每次去沙坪公园，都要去到你父亲那个没有立碑，几乎是平地的一堆荒草的地方诅咒那场灾难。只要你明白，当年我常来你家是出自真心同情你家的遭遇，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了。朝凤，你在哪里。我多想再见到你，亲口告诉你父亲遗骸的真实埋葬地，哪怕你吐我一脸唾沫再给我一棒……

1969 年秋，东窗事发，陈捷和许洪凯先拘押到重大某处（那时隔离审查，相互不知羁押地）。我也在军宣队、工宣队组成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校人保组反省。一天，工宣队员、重大人保组副组长赵伯忠（重钢砌炉车间党总支书记）和另一位工宣队员（时间久远，记不得名字、只记得姓）陈某某、带着陈捷和许洪凯到人保组来当面对质。陈捷和许洪凯都把枪杀陈汝福的责任往对方推。赵伯忠要我证实谁讲的是真实的。天哪，头头们的事，他们商量时，我在一边等“任务”，我怎么知道呢！我又想到这场武斗，大家在气头上，脑壳发热时乱搞犯了罪。现在却推责任，太不义气，太不耿直了。想到前几天，长安厂保卫科来调查唐朝全、冯治国打死李平正、何明贵一事时。我说：“唐朝全、冯治国当时客居重大，一切行动是听我指挥。他们只是动手而已，责任在我身上。”长安厂来调查那位姓

郑的干部说：“小郑，你年纪轻轻，莫背死人子过河哟！”我当时就答道：“我叫他们打的，他们敢不打吗？怎么说我背死人子过河呢！”我对相互推卸责任感到鄙夷。我根本不清楚陈、许二人谁先提出搞掉陈汝福，怎么可以乱作证呢。事到如今，同学之间相互咬，太可悲了。我说：“赵师傅，他们俩都是我的同学呀，我说谁呢？我的确不晓得。”赵伯忠指着我鼻子说：“崽儿你太没得是非观念了，这点觉悟都没有。”

1970年3月底，陈捷和许洪凯从重大关押他们的地方送到了石板坡重庆市第二看守所。许的父亲和妻子到重大来找他，打听他的下落。我当时软禁在人保组（沿江马路原马列主义教研室），我隔着窗子看见许洪凯的妻子挺起一个大肚皮，怀孕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想到我的妻子生我儿子的悲惨经过，对许妻十分同情。又觉得当晚在陈捷未碰到许洪凯之前，连我都不晓得还有个陈汝福，是陈捷碰见许之后才发生的枪杀陈汝福一事。又想到，武斗最激烈那阵，陈捷多次叫我搞死几个俘虏为烈士报仇的话。我推测陈捷一定是主凶。于是我找到赵伯忠说：“赵师傅，前次陈捷、许洪凯为枪杀陈汝福一案对质时，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现在我作证，许洪凯是冤枉的，陈捷是主凶。”之后，我逢人便为许喊冤。以致后来在松林坡礼堂批斗我，工宣队赵伯忠发言时还说我“为其他被审人犯鸣冤叫屈”。不久，市公安局两位警察来为陈汝福被枪杀一案向我取证时，我仍为许鸣冤叫屈。公安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许洪凯冤枉呢？”我当晚没有参加他二人的谈话，能有什么证据呢？一急之下我干脆说：“是我和陈捷先商量的。”笔录上我签了字，一槌定音，为许开脱了罪责。后来陈捷为此被判刑13年，许免于刑事处分。回中梁山重庆锻造厂工作。我和陈捷后来都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相见时，我都不敢正眼看陈捷。因为我对我的证词问心有愧。

8月25日晚，冶金系301的H送来一具死尸，希望我帮助处理，我也当成“烈士”埋到了沙坪公园。因为不是815“烈士”，我没有输甲醛，更不会用白绸裹尸，只是贴了口棺材。此人怎么死的，姓甚名谁，因为没有苦主，也无人追究。我至今如坠五里云中。

武斗期间，在串联大楼还死了两人，是外单位的人搞死的。一个是吊在串联大楼大门外黄葛树上打死的。我没有处理那具尸体，他们自己“消化了”；另一个是空压厂干部包积桢，在串联大楼五楼一间教室里被打死。请我去处理尸体时，

教室内血迹斑斑，地上和窗台上有拖尸体留下的血痕。为掩盖真相，伪造了包积桢跳楼自杀的现场。实际上是抛尸于窗外，血迹处理干净后，空压厂通知包积桢的女儿来领的尸。

此外，师专附中（今八中）学生在小龙坎抓到一个巴县石板乡年轻的“财扒”（小偷）王某某，毒打致死，也拉来重大请我处理。我同样贴了口棺材，找人通知死者王某某的家属。王的姐姐用板板车来把尸体拉走了。还有一个死者，建设厂反到底武斗头目杜全。他不幸被俘。在一天上午送到二舍来时，我在停尸房处理尸体，因此不知是谁送来的。下午下班将何开泰等人送回二舍时，才发现角落里睡着一个身材矮小，瘦弱不堪的人。晚饭后，建设厂“八一兵团”头目陈忠文（外号陈大炮）来找到我说：上午送来那个人叫杜全，是建设厂“红大刀”的勤务员，要我把人交给他。人家单位来提人，交还人家顺理成章，他用辆吉普车把人带走了。我感到郁闷，“红大刀”和“猛虎团”、“金猴”、“孙大圣”都是反到底赫赫有名的武斗队，让 815 闻风丧胆，想象中，应该个个虎臂熊腰，身材魁梧，怎么会有这种瘦小猥琐的司令呢？……后来听说，杜全被害了，家里留下一个 70 多岁的老母亲，靠吃救济和拾垃圾为生，很可怜的。

.....

由于我“尸长”的特殊身份，许多与尸首有关的故事我自然很清楚。不要怨恨那些“杀人者”有多可恶。我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的搏杀，他们“杀人”，一没有杀父之仇，二没有夺妻之恨，杀人者和被杀者根本就不认识呀！被杀者，当然是无辜的，值得同情。而杀人者都是含着一腔义愤，冒着坐牢和杀头的结局去为死去的同学、朋友、同事、解放军“报仇雪恨”，疯狂地泯灭人性，误入歧途。这种罪孽，除了他们自身应该承受外，同样应归罪于煽动仇恨、鼓吹“文攻武卫”的人.....

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书稿，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本刊特稿】

按：本文作者赵晓铃，女，文革时是重庆第四十一中学（今已改还原名巴蜀中学）高三学生。后曾任《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已退休。

血腥的花季

赵晓玲

新年第一期《记忆》上本杰明的文章对我很有触动。

想起十多年前一位美国小伙子好奇地问我：“文化大革命时，是不是学生都不上课了？”他大概觉得学生不上课是很好玩的事。

我淡淡地说：“不光学生不上课，老师校长，还有作家艺术家都被打倒，不能工作，还被侮辱，有的被迫害死了。”

没想到他一下子惊骇，内疚得不得了，直说“对不起对不起”，说“我是不是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那种神情让我很难忘记。

又过了十年，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有意地删除了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以为只要不说，那伤疤就没了。

现在，美国人本杰明说：“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反倒让我惊骇了。他的热情的追究，对生命的痛惜，让我感觉我们有多么冷漠！往事历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血腥的时代。

1967 年春天，我和班里的几个女同学在化龙桥的一家电机厂劳动，也和工人造反派一起写大字报。这里还有几个其他学校的同学，多是女孩子，他们居然不计较我们的出身，我们就参加了他们的井冈山红卫兵。红袖标上白色的“井冈山”三个字完全是毛主席的手迹，我非常珍视。在我自己的学校里，我只能参加一个叫“赤卫军”的红卫兵外围组织。那时大串联已结束，大家基本上回到重庆，几个人占个教室就可成立个小组织。每天的活动就是在学校里学习什么文件，参加会议之类，基本无所事事，自己领点纸来印点传单散发就干革命了，在学校，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的多数活动我们是不能参加的，只能站在革命的门外，那不是好滋味。听说可以自己组合到工厂参加劳动，我和几个女同学就去了。

井冈山红卫兵原来叫井冈山公社，串联时我到重庆大学去看过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徐光明等大学生，听他们说了自己怎样受迫害，好佩服，认为他们是最革命的组织。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基本不搞出身成份歧视，有好多人都是爱读书的学

生，大家很容易成为朋友。

那时重庆已没有保守派的戏，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而且分成“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派仗，不那么关心单位的斗争对象了，对“牛鬼”们的镇压，不过是证明自己革命的手段。两派竞相争取群众，争取中央支持，其实也就是争取头头们在夺权中的地位。各单位里的两派也会在乎这个，我妈妈单位里一派掌了权就不给另一派发工资，但一般的群众，尤其是学生们，根本想不到这些。

电机厂里还有两个来宣传革命造反的首都红卫兵，是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社员，要说“煽风点火”，他们真是来晚了。不过也不是人人都要叱咤风云，他们就是被革命潮流冲到这里来逛逛，总部说支持反到底，他们就支持反到底，有时到外面开开会，有时和工人们一起开开会。这个厂里八一五少，反到底多，对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很好。男生女生分别住到单身工人宿舍里，自己买了饭票到食堂吃饭。工人们还在上班，造反派常来看我们，谁也不问我的出身，一视同仁。我很少下车间劳动，总叫我抄写点什么，做革命小将的感觉很好。正值青春期的同学们，不同校却因为同一派，有患难与共的动人友谊。生活里不光是革命，还到嘉陵江里游泳。

井冈山红卫兵自来与“八一五”对立，现在是坚定的“反到底”派。我们在电机厂也听说，什么地方的两派不光是辩论，而且打起来了，但不是很了解。厂前马路上的公交汽车，晚上十点才收班，周末回家，我有时一个人徒步往返，也不会有什么事。真的，那时治安还很好的。

电机厂对面就是后来被称为武斗之花的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控制）。

有一天，工业校传来高亢激越的男声独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首歌是用毛泽东词谱的曲，词曲都好，很是流行，每有武斗，必放此曲，似乎成了武斗号角，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真要打了！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唱，我们又兴奋又紧张。

我和我的同学小陈一起往工业校走去，以前我们和工业校学生无多来往，但

知道和他们是一派的。在这样紧张的时刻，我们无法袖手旁观。我们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武斗，也想看看。人对于暴力事件，都有兴趣吧。

工业校操场空无一人，同学们都在教学楼里。教学楼底楼的门窗都用砖石堵得严严实实，门口有持钢钎的同学守卫，因为是一派（反到底派）的，他们放我们进去了。里面很暗，遍地狼藉，在灯光下我们看见了他们的“森严壁垒”。课桌课椅都搬在走道上堵着，他们不但有木棍铁棒，还准备了一包一包的石灰，瓶装的硫酸之类从化学试验室里弄出来的东西充当武器。

我突然感到恐怖。一旦两兵相接，是很有杀伤力的！都是同学，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只是观点不同，为什么要这样相互伤害呢？在这样的打斗中流血牺牲值吗？

有两个女生我认识，很可爱很纯朴的。一定要打么？我问。她们说，准备好了，如果他们进攻，我们就打。看她们意气风发的样子，我非常担忧。

从工业校楼里出来，小陈和我向山上爬去，这山叫虎头岩，上去不远就是大坪，那里的石油学校也是一中专（由八一五派控制）。那些未来的石油技术人员头戴藤编的安全帽，雄赳赳地在虎头岩上站了一排又一排，手里握着的钢钎在燥热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他们看见上来两个女生，就喊，走开！走开！

我们不管不顾地抓住杂草攀上岩石，向这些战士们走去。我们要让他们明白，工业校也是有准备的，他们现在这样下去，一定会打起来，结果双方都会受伤，这样的惨剧对革命运动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人家观点不对，那也是红卫兵，至少是受蒙蔽的革命群众。人受了蒙蔽只能讲道理，只能辩论，打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红卫兵不能相互残杀！

我们两个女生就这样跟那些陌生的男生们讲。他们奇怪地看我们，革命斗争到了这样的时候，这两个娇小姐还来唠叨什么道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他们根本不理我们，轰都懒得轰走我们，甚至不怕我们是奸细，轻蔑到极点的样子。

有革命做理由，那些身强力壮的男生内心对暴力的渴望已难以抑制。他们想到后果么？或许，他们正要用鲜血来证明对革命的忠诚，来表现男人的勇敢。

那天并没有打起来，不知为什么，反正决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女生的制止。后来这两个学校，加上石油校附近的河运校（反到底派），武斗非常厉害。河运校美丽的校园被烧得只剩下废墟。很久以后，我去过工业校，到处是碎砖石，教学

楼破烂不堪，门窗都没有了。

近年读一些民国人物的材料，发现早先在卢作孚领导的北碚西部科学院做代理院长的李乐元先生，中共执政后在工业学校任教。文革时，李先生是批斗对象，1969年，李先生在迫害中病逝。在此之前，工业校红卫兵曾令他制造炸弹，这位已成为“牛鬼”的知识分子竟抵制了。可见那时有理性的人还是反对武斗的。

这年春夏之交，重庆武斗迅速升级，似乎是井冈山总部让我们到重庆医学院去印传单。医学院位于交通要道，与两家大兵工厂相邻，房子又多，成了反到底派大本营。许多人在楼里忙碌着。人们都尽可能地去忙，越忙越革命。那时就听说，八一五有枪，把西师八三一和北碚的反到底派赶出来了。武装斗争似乎是从那里开始的。

7月底的一天，这里也要发枪了！

在重庆医学院的一个礼堂里，举行了发枪仪式。我不记得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只记得那种非常安静，又非常不安宁的气氛。发的是新崭新的五七式步枪，是附近的兵工厂建设厂生产的。人们一个一个地上前领枪，一脸的庄重和圣洁。我在那看着，也感觉庄严兴奋而又紧张。真的要打仗了么？因为一向的革命教育，我们一直对自己没有生在战争年代感觉遗憾。但我又有些惶惑不安，眼下这算什么战争呢？工厂的造反派都是男的，没有女孩子领枪，我也没有要领枪的要求和热情。

两天以后，发下的枪就响了。

听见枪响后，我兴奋地爬上楼顶。医学院的外科大楼顶上是一个制高点，夏末的夜晚很凉快。有人喊，趴下！我趴在一个男人身边，我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北碚的工人，换洗衣服都没有带就被打出来了。

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很响。我问，你们那里早就武斗了？有受伤的吗？

有。

你害怕吗？

怕。他腼腆地说，后来身边有人被打死了，就不怕了。

你想要报仇？

对，他们打死了我们的人。

这个我连面目都没有看清的人，他这话我记了一辈子。从此知道了，仇恨，

一种很直观的血仇，会让人在一瞬间就忘记恐惧，而一个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暴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一块不断倒下，直至最后一块。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再问为什么开打，但对血腥味会习惯，生命就不再贵重了。

我确实想不明白，为什么拿起笔做刀枪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变成真枪实弹的战争了？而且枪击炮打的双方原来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一个车间的工友，一个单位的同事，谁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怎么突然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了？但在这些不怕死的人面前，我总感觉惭愧。我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又犯了啊？我在整个的高中，甚至文革后的大学阶段常被这样批评。和同学珞加聊过一些想不明白的事，珞加说，不想了不想了，不敢想。我们必须把与革命不一致的想法掐掉，否则便无法面对这个畸形的世界。

那个周末回家后，母亲再不让我和妹妹离开家，我也没有死犟着要留在重庆革命，我们全家到成都躲避武斗去了。

在成都，我又参加了从重庆转移来的井冈山红卫兵的活动，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工作。青春的我无法抗拒革命。

《井冈山》编辑部都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师生，从北碚撤退来的。他们也是主要撰稿人。川外的教师林那时才三十多岁，他的夫人刚生了孩子。林执笔写了《人民战争救山城》，《再论人民战争救山城》，还有三论四论五论，前四论都刊登了，五论打成纸型没有印出来。井冈山红卫兵人数虽少，但鼓吹武斗实在很出风头。文革后期，林因此被捕入狱四年。

我和十四中的小杨跟着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老王跑印刷厂，搞发行。在成都印制三厂印《井冈山》，那位冷师傅看到王大学生破鞋破棉衣，说，你们红卫兵搞革命鞋都没得穿的，我们给你们印！

报纸弄回重庆卖，两分钱一张，我的书包鼓鼓的，尽是分分钱，一分钱不少，所以总让我管钱。成都到重庆，同学们都“混车”（不买票），我不能接受这种不规矩的行为。革命也应该是干净的。同学们嘲笑我，却总是给我和小杨买半价火车票，用学生证就能买到。坐慢车，不到五元钱。

林老师的文章越写越大块，报纸从四开印到对开。我看出来是仿《论持久战》的写法和笔法，仍然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重庆人之间打真正的战争的道理。不过我很认真工作，也很佩服林老师。这毕竟是革命哪！明白不明白都得革

命。

我读明白林老师的文章是在文革以后，他又活跃在文坛上，是我任职的文学刊物的重点理论作者。1989年春天，他还写了一篇文章，“ $100=1+1$ ”，大意说“百花齐放”不过是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是“ $1+1$ ”，但又不让资产阶级发言，就一家。那年春夏之交一过，就成了靶子。

记得当时印《井冈山》的另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对我说他是逍遥派，感觉这个运动没有意思了。他看着我摇头，说，你上当了。我想问他为什么，又觉得不能像他那样落后。

这是不是本杰明说的“示好”呢？不全是，本杰明不知道，那时人们参加革命，多数因为不革命就会被打入另册。他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怕被排斥于革命之外的那种恐惧。

武斗终于消停了，复课闹革命，让学生们回到学校，当然不是上课而是革命。那时我才知道，小陈和我分手后，和井冈山的同学们到望江厂闹革命去了。我看到她们照片上扛着枪的飒爽英姿时，感觉有一点惭愧。假如不是妈妈把我带到成都，我会和她们在一起的，但我会对准一个明知不是坏人的活人开枪吗？虽说我很先参加民兵训练就学会了打枪，射击成绩还很好。不行，我不会那样义无反顾。她们大多比我低年级，她们有没有想过，假如死了，不管是自己死了还是对方死了，值不值得？武斗搞得厉害的，多是高二高一的同学，他们没有我们想得多。

小陈是高一的，学习好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那样聪明能吃苦又朴实的女孩。她的父母都是相当优秀的教师，真正的书香门第，母亲是右派，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绝对是孝顺孩子，会干很多家务，但她必须革命。在我们学校，她是进了黑五类子女学习班的，但井冈山红卫兵不歧视她，大家都喜欢她，我相信，为革命，她会豁出命去干的。下乡当知青时，她劳动很忘命。文革后，她考上大学，后来是很棒的教授。

飒爽英姿里最漂亮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樱。她白晰高挑，眉眼秀气，真是美少女，和井冈山那拨人也是生死朋友。她的出身栏里填的是“革命干部”，她父亲是老资格的新闻记者，做过重庆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编，革命成功后被打成胡风分子监禁一年，后来在出版社、图书馆做领导。这样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不是很红的，据说班里的红五类对她有些另眼相看。她学习好，背得很多诗歌，胆小，爱

哭，又特爱干净，关心人，小学就和我同班，常揪了我一起去洗澡。文革后，樱要考大学，因为历史的教训，爹妈都不要她考文科，她说，那就不考，考理科考不上的。父母才让了步，她考上中文系，毕业后在出版社做编辑。她的温柔善良，让她有许多朋友。她爸告诉我，樱那么温柔的人在文革初有一壮举：一回家就用斧子砍家里的雕花八仙桌，认为桌子是“四旧”。他说，她单纯，轻信，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直都这样。那么，当年她为什么也去拿枪？前年，她从国外来电说到，我们这些人是应该忏悔的。她绝对是真诚的。

在文革中，除了参加会议呼口号，我内心里实际上应属于“逍遥派”，确实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不恨什么人。至今记得那时偷偷读的雨果、普希金作品里的人物，早记不得班里谁是八一五，谁是反到底了。但是当年，我一直是以革命不坚定为耻的，以不能摆脱贫资产阶级人情味而羞愧。

本杰明这个外国人说，“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这里的关键词无疑是“罪犯”。这个词击中了我。

在大规模的武斗中，被杀害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人，杀他们的，算不算犯罪？武斗中杀人的一些人，后来在一打三反中被清算，有的被判了刑。我们办鼓吹武斗的报纸，算不算犯罪？

多少罪恶假革命而行，可是我们没有罪感。

我们怎么会有罪感呢？本杰明知道么，在那之前也有过许多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会死人，死无辜的人，死得很惨。死得比狗都不如，不许对死者有怜惜，哪怕他的家人。而无情斗争是受到鼓励和赞扬的。

前几天，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对我说，他有一位同学，那时十五六岁，镇反时上台发言表态拥护政府，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的父亲当场被枪毙。那位父亲是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一位中层干部，很优秀的人。后来平了反。

我知道还有一位小姑娘，十四岁，也在这样的场合揭发检举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国大代表，也当场被枪毙。她的父亲很痛苦，却一句话也不敢说。故事是这位父亲的同事告诉我的。

文革时，有一天我在电车上遇见初中同学小平。到哪去啊？

她说，去下户口。

下户口？下什么户口？

她淡淡地说，我爸爸自杀了，我去给他下户口。

那种口气完全是说她爸爸出差了，她要去给他领粮票一样的。

她口气的平静和眼神的淡定让我震惊。算来她那时也就十四五岁。真的，那时死个人算啥呢？对于血腥味，人们都习惯了。

小平绝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后来她成为一所很好的托儿所的所长，有名的工作狂。

在革命成为时尚的年代，什么都不重要，人情、亲情、信义、道德、良心，是与非都不重要。生命在革命面前都算不得什么，尤其是“阶级敌人”的生命，那根本不如草芥。革命第一，革命比天大。罪与非罪，界限在哪里？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不爱红装爱武装”，裙子都不敢穿，旗袍更是绝迹，家里如有这样的旧衣，一定要毁掉。上辈人的婚纱照片要烧掉，母亲烫发的照片也不能保留。凡是与暴力相连的东西，刀枪军衣军帽之类都成为美，成为时尚。传统的优雅，文明，礼貌，温柔敦厚都是被轻视的，被视为丑陋不堪的，“大老粗”才美。

我的大学同学龚巧明（后来因车祸死在西藏的作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幼儿园老师，文革时她为了表现革命，赤脚回到家里，当着母亲的面抽烟，讲粗话。还有一位同学，她的母亲出身名门，才华超群，是有名的古典文学教授，给学生讲授典雅隽永的宋词。母亲很自尊，文革中每一张针对她的大字报都如尖刀戳向她，一天，母亲看到这些大字报里，竟有一张出自于自己心爱的一双儿女之手。这一刀戳得太深太重了。第二天，母亲自杀了。那一年，女儿13岁。她心上也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流血的伤口。

我的这两位同学，她们也绝对都是有教养的充满爱心的人，而且非常爱文学。巧明在作品里常提到姆指姑娘，小美人鱼。我相信美丽的教人真诚善良的童话是她文革前教养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这一切都必须抛弃，过去的文明必须毁灭，过去的教养必须颠覆，颠覆越彻底越革命！那时有个电影叫《决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种是与非的颠倒，美与丑，善与恶的错位，不要说美国人，就是今天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都难以想像。

四川省有位知名民主人士，省级高干，他长子在文革中领了弟弟妹妹回家斗老爸，还抄自己的家。这位老人的家庭，中西文化都很深厚的，对孩子自然重视

教育。中共执政后，他成为资产阶级中的左派典型，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这些人的孩子，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他诚惶诚恐，把十几岁的儿子们都送到部队，走上革命道路，不上大学了。所以现在他家的女儿都比儿子文化高。这位老先生不能理解儿子运动中的不孝之举，至死没有原谅他的长子。

革命狂飚呼啸而过，卷走了一切。风暴过后，要找回丢失的东西，容易么？

现在，文化怀旧很热，热到秀，热到时尚，可是有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平反冤假错案，补发工资，恢复过去的地位，赔礼道歉，做了很多很多，可是，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些！也许，那些难以平复，无法补发的，正是最珍贵的。

前年春节，一些老井冈山红卫兵聚了一下，我发现这些人还是生活很认真的好人，是如今社会上不多的那种好人。多年不见，大家很高兴，吃饭，喝酒，没有聊什么沉重的话题。不打牌，好像这一拨人中的多数都不大会这种现今很普遍的时尚娱乐。

不管我们后来成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我们的花季年华里，弥漫着血腥。血腥味至今未能散尽。

【本刊特稿】

重庆 815 派文革墓群中的反到底派死者

韩平藻

重庆文革墓群原本是文革武斗中 815 派死难者的坟场。据笔者调查，其中至少有四位死者并非 815 派的“烈士”，有二位甚至还是身份明确的反到底派成员。

原重大 815 战斗团的“殡葬连长”（同学们戏称为“尸长”）郑志胜在回忆录中写道，1967 年 8 月 20 日傍晚，重大学生食堂的炊事工刘平治，被重大 815 的几个武斗人员在审讯时捆死了。因是本校职工，许多人都认得，怕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郑受命将其尸体秘密处理掉，他便把刘当成“烈士”装进棺材。因刘平治的妻侄陈汝福是与刘一起被抓到的，刘死了，陈活着，事情暴露了不好办，捆死刘的有关负责人就一不做二不休把陈也“处理”了，不留活口！郑又受命处理尸体，他把陈与刘装进了同一口棺材中，次日埋到了沙坪公园墓地。刘平治文革初期参加了官办的工人纠察队（俗称“工纠”），属于“保皇派”，是 815 的对

立面。陈汝福也可以肯定不是 815 派成员。

陈的尸骨后来被郑充当反到底派河运校航锋的尸骨叫该校领走了。从郑的回忆可知，此前他曾在沙坪公园墓地中埋葬了一个死于中梁山武斗中的河运校航锋的成员。此外，在 8 月 25 日，郑还在那里埋了一个重大 815 战斗团 301 武斗队的人要他帮忙处理的无名死者，郑知道那不是他们的“烈士”，因此也很可能是对立派的死者或被枪杀的俘虏。当然这几个死者也就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墓碑。如不是“尸长”郑志胜在四十年后的回忆中交代出来，这只能成为永远的秘密。

另据笔者调查，在这片重庆 815 派的文革墓群中，还埋葬有一位身份明确的反到底成员，其命运与以上几位冤魂完全不同，且极富戏剧色彩。

朱本武，重庆字水中学初 66 级学生，文革中属反到底派。死于 1968 年 3 月 8 日参加 815 派攻打长寿县云台地区川东石油局反到底派的战斗中。

据朱的大哥朱本滔回忆说：

反到底观点的弟弟在家中，被他耍得好的字水中学 815 派同学叫起就走，那时我们就住在市中区沧白路，离河边很近，他们马上就到千厮门码头上船直奔长寿。是去支援长寿云台地区川东石油局 815 派的战友。当时，长寿反到底派有当地驻军（涪陵军分区）支持，815 的就打不过反到底派，弟弟实际就是帮字水中学的 815 同学去打反到底。朱本武在进攻一栋楼时，冲进去就没有出来。战斗在第二天结束，反到底被赶走，楼也垮了，在废墟中挖出了弟弟的尸体，他是头部中弹，估计他一冲进楼就中弹身亡。我接到他同学通知去长寿接他回来，集中埋在了沙区公园这里。在埋葬时，其他 815 的死者战友、亲属听说朱本武是反到底的，认为不该埋在 815 的烈士陵园里，不准在此安葬，差点发生火并。朱本武的 815 派兄弟伙坚称，“他虽然是反到底的，但是他是为我们 815 战斗牺牲的，我们不能对不起他”……

我们一家分成两派，父亲和他是反到底的。我在沙坪坝供电局是 815 的。

那时家里很穷，朱本武回江北（字水）学校都舍不得花 5 分船票钱坐轮渡，夏天他都是游泳过河上学。修坟也是长寿云台川东石油局 815 出的钱，运动后期他们单位还找我出了个手续，说要做账。

2004 年清明节，朱本滔还专门为弟弟刻了新的墓碑……

四十多年过去了，朱本武长眠在 815 的哥们中间。比起前述那几位死后还被隐姓埋名下葬，使亲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比起那些怀着同样宗教般的虔诚战死而死无葬身之地的反到底战友，朱本武能安葬于此，年年得到亲友的凭吊、祭奠，还算是幸运的。

2010 年 1 月 21 日

【本刊特稿】

关于重庆“红卫兵墓园”墓葬人数的再考证

陈晓文

2010 年初，重庆“红卫兵墓园”被列入重庆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报道中，对该处墓葬人数确定为 573 人。该数字可能来源于当年有条件接触、汇总造墓信息的知情者。但它只能作为现在确定墓葬人数的参照起点，不能作为现成结论。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现存的围墙没有把当年的所有墓茔全部围进来，其范围小于当年墓葬实际；二，有极个别墓茔有被移葬出去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在 573 人的数字里被扣除。

（右图：墓园一角。刘庆丰摄）

我在 1995 年发表的《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中（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8 月号），根据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 92 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统计出这里实际墓葬的死亡人数是 345 人（包括实有人名累加和



碑文风化的空格占位累加两种情况)。每座墓平均安葬人数为 3.75 人。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 21 座墓, 若平均安葬人数扣除 25% 的误差所得数值 (2.81 人 / 墓) 相乘, 估计葬有 59 人。加上已知数字, 确认此地共掩埋 404 名武斗死难者。

后来考虑到该文仅从负的方向考虑了误差, 没有从正的方向考虑误差, 实际上 404 人只是该墓的一个下限数字 (上限应该是 443 人)。也就是说, 这里的武斗死难者最少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而持平的数字是 424 人。减去 11 号墓 (均系笔者为记叙方便所做的编号) 叶申明 “死于烧伤” 和 32 号墓杨宏柱、46 号墓谭德林 “不幸病故” 的 3 人, 埋在这里的武斗死难者应为 421 人。

2005 年以后个人志愿者曾钟和 2007 年公园方面工作人员王友群、秦本志、李中华 (受聘者) 介入调查, 得到大量口述材料。这一工作进展显著。他们提供的修正情况是墓葬总数为 131 座, 增加有确切人名的 4 人 (3 墓), 有造墓单位 (3 墓) 和墓葬人数的累加有 21 人。

据此可以修正为, 从有确切死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 98 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 实际累加统计出 370 人的墓葬死亡人数 (包括实有人名累加、碑文风化的空格占位累加和口述材料累加三种情况)。每座墓平均安葬人数为 3.78 人。拿它乘以已不可考的 33 座墓, 得到 125 人的数字。累加数字和推算数字相加为 495 人 (中间数)。如果对推算数取 +25% 的误差, 取值范围为 +31 人, 应为 464—526 人。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一, 1995 年的计算扣除了确知不是死于武斗的 3 人, 着重点是厘清埋在这里的武斗死难者; 而本次修正计算没有做这种扣除, 意在计算墓葬人数的总数(并不否认此墓包含了极少数不是直接死于武斗的人)。

二, 曾钟对这样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 认为, 大墓的数字容易被发现, 小墓的数字容易湮灭, 按统计推算可能把每座墓的平均数算大了。实际数字可能大大小于 573 人。从墓葬分布实际看, 这一质疑不无道理。

三,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曾经埋有和现在实际葬有两个概念的区分上。要把该墓作为文物, 这一区分和必要的审慎在田野考古学术规范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强调墓葬人数的确立, 要有完整的基础材料和合乎逻辑、可以验证的完整

计算过程。这一方法的好处是透明，可以复核并且质疑，而持之有故的质疑能够修订计算，使工作日臻完善。

2010. 1. 14.

【乱世民情】

我曾是官办红卫兵

东 夫

班主任的深谋远虑

1966 年我在成都四中读初中二年级，6 月份学校便开始“停课闹革命”，成天学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让我们一头雾水的“三家村黑帮”，到后来大部分学生都溜回家了，只剩下一帮活跃分子在学校蹦跶。8 月份我正天天在河里扑腾，“十六条”下达，学校通知全部学生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回校的第一件事便是选举班的文革小组，取代过去的班委会领导全班文革，采取所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我平时表现平平，班委、团员都无缘，却出乎意料地被推选为班的文革小组组长。后来才知道是班主任操纵选举的结果，因为她认为我性格温和，不会做极端的事。

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斗打老师校长，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们一个个变得横眉怒目龇牙咧嘴——这是革命意志坚定的表现。大势所趋，谁也不愿意被人视为革命意志不坚定。不堪凌辱的老师卧轨的卧轨，上吊的上吊。我们班的生活老师谢莲芳是个大美人，三十多岁还是独身，大字报揭发她丈夫在台湾，她至今不结婚是等着她男人反攻大陆回来。她在寝室的门把上系一条绳子套在脖子上，身体往下一躺就死了。

不久学校成立了官办红卫兵。全市的官办红卫兵成立大会是在成都市的锦江大礼堂举行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到会讲了话。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是他的儿子，原先是学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又是学生党员，时常穿一件打满补丁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但人人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官办红卫兵鼓动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

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等）子女，麻五类（中农、教师、职员、自由职业者、小手工业者等）子女，从北京传来的最新歌曲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后两句看起来还有点选择余地，实际起作用的是前两句。“黑五类”子女是不让参加红卫兵的，而且遭到侮辱打骂。高三一对“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恋人被红卫兵打后，双双从三楼的教室里跳下身亡。“麻五类”学生也抬不起头，大多默默离开学校当“逍遥派”了。

成都四中是著名的重点学校，据称始于西汉文翁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官学，1964年大力贯彻“阶级路线”后，干部子弟比例大增，1965年进校的初68级学生，干部子弟占了大半。官办红卫兵也以干部子弟为主，我父母虽算不上什么官，我也沾“革干”出身的光参加了红卫兵。邻居蒋叔叔在西藏当过兵，知道我参加了红卫兵，送我一条军官皮带，这是当年最时尚的东西，扎在腰上真是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再唱着“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语录歌，念着语录本上没有的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忽然间觉得已经肩负起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重任，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了。

官办红卫兵造的是“封、资、修”和“四旧”的反，实际干得最起劲的是打人和抄家。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抄一个据说是军阀太太的家，在抄出的一大堆衣物中见到一双银色的蛇皮高跟鞋，让我无论如何不能将它和那个被打得趴在地上如同拾破烂老妪的女人联系起来。一次是抄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家，在地下室里见到满架满架的葡萄酒，“小将”们怒斥传教士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传教士结结巴巴地说，这些都是外国人留下来的，我从来没有动过啊！然后小将们挥舞棍棒将酒瓶砸了个稀巴烂，红红的酒淌在地上淹到脚背。

一位“小将”将传教士的手表扒拉下来，“哇”地一声惊呼，众人都围上去看，这块表的表壳和表盘上镶满大大小小的钻石，在房间里一盏古式吊灯的照耀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把众人都看傻眼了。传教士平静地解释说，这是解放后外国传教士走的时候送给他的。这块表是谁带走的、最后落到谁手里我一无所知，但它的灿烂华丽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以致后来参了军还跟人吹过并因此惹出麻烦。1976年10月事件以后部队清理造反派，有人状告我当红卫兵的时候

曾经抄到过一块钻石手表，部队领导正儿八经找我谈话，还派人到成都搞外调，当然是一无所获。

我虽然拥有那时最时髦的打人利器——带铜扣的军官皮带，但我从未动手打过人，看来班主任真是深谋远虑。

赴京途中

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大家的心全飞到北京去了。突然有一天，学校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各班选举赴京代表，每班四个名额，我荣幸当选。我最要好的同学吉小峰原先在班上人气很高的，因为父亲文革初期就成了西南局的批判对象而没有被选上，眼泪汪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实际上我们那时候除了革命的豪言壮语，人情世故一无所知。

这年我 15 岁，还从未出过远门，火车见都没见过。知道我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父亲大为高兴，出发的时候给了我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住校兼伙食一月才六块五毛呢。

这是 10 月上旬的一天，成都尚未天下大乱，交通状况也不像一两个月以后那样混乱。我们乘坐的是成都中学生赴京代表的专列，有人带队，每人发几个馒头，次序井然地登车出发。沿途的人们似乎都知道我们是到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大大小小的车站上敲锣打鼓，偏僻的道班上也有人列队欢呼，连乡间的小孩也追着列车跑，天气已经见凉，许多孩子还光着屁股，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贫困。

到西安的时候出现乱象。只见无数的年轻人拥挤在站台上，打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标语，又哭又叫地试图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和军人组成人墙拼命阻挡。列车上的广播反复要求大家关好车窗，不许下车，所有的车门也关得严严实实。我们本来准备下车买点吃的，只得作罢。到郑州的时候，我的馒头早已经吃光了，车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拥到站台上的食品柜买吃的，未等我挤到柜台前，便听列车员大声嚷着催大家快上车，原来又有大批人快冲进站台了。我还挤在车门口，列车便已启动，我拼命抓住车门的扶手，一条腿悬空，自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镜头，列车开出好大一截，才被列车员连拉带拽地弄进车厢。从车窗里一望，还有一群没能上车的人在发疯似地追赶列车，其状甚为惨烈。

我一无所获，上车后却见有人开始滋滋有味地大嚼烧鸡，据称那叫道口烧鸡，

河南特产，美味无比，一元钱一只。馋得我咕咕地吞清口水。我们班的四个赴京代表，两男两女，那时候男女界限分明，跟女同学说话都觉得害羞，和女同学接触多的被称为“骚哥”，为众人不齿。上车后大家坐在一起，居然形同陌路，无话交流。这时一位女同学将一个馒头递到我手上。我立即接过往嘴里塞——“你好”、“谢谢”、“对不起”之类的文明语言，我是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才会说的。不过吞下这个馒头后，我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生长时间对话。

车出郑州，列车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原先听惯了的车轮在轨道接头处哐当哐当有节奏的撞击声，变成了哗啦啦一片。北京快到了！我们要见到毛主席了！有人一声高呼，车厢里顿时欢腾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造反有理》、《下定决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等歌曲此起彼伏，翻来覆去，声嘶力竭。我们班的女同学李少澜很会唱歌，学校和班级的文艺演出每次都有她的独唱。震耳欲聋的喧嚣终于停下后，坐在我身边的她轻轻地唱了起来，什么《人说山西好风光》、《樱桃好吃树难栽》以及我不知道的山西民歌。她父亲是南下干部，老家在山西，如今“左手一指”就是她的故乡了。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工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轻柔婉转，呢喃如燕。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众人那些慷慨激昂的歌是唱给大家听的，而她是唱给自己听的。

后来她父亲遭到冲击，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她。

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到北京的时候是夜间，迷迷糊糊地到了一个叫清河小学的学校。小学已经没有学生，全部腾出来供接待“毛主席的客人”。后来我才知道，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北京全力搞好接待。所以学校的广播里称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学校教室全是平房，里面是稻草铺的地铺，被褥齐全，躺上去又软又暖和。吃饭不要钱，每天还有一顿米饭。接待我们的学校老师讲，这是对我们南方来的革命师生的特殊照顾，他们平时很少吃到大米。但我觉得和家乡的米饭相比，北京的米饭吃起来糙糙的。不过那年月大家对吃并不讲究，不管什么填饱肚子就行。

第二天下午，忽然听到喇叭里叫我的名字“成都四中的×××到校办公室接电话”，原来是我大姐打来的，她在北京当兵，自从1960年她离开家以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她。这个当解放军的大姐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候，她怎么能知道我住在这里，让我感到吃惊。按照她说的地址，第二天我找到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解放军某部大院，在见到姐姐的同时见到了弟弟，原来他也是赴



京代表，和我坐同一次列车到北京、住在同一个地方。他那年才十三岁，比我矮一个头。

姐姐带我们照了相，在大栅栏吃了包子。她告诉我们，她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组织保卫工作，前次(9月15日第三次)接见人太多了，秩序很乱，本来安排像国庆游行一样让大家从天安门经过，结果前面的

人见到毛主席就不走了，周总理亲自指挥让大家走也无济于事。前面的人不走，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广场上人越积越多，连个缝都没有，好多人根本没看到毛主席。毛主席走了以后，成千上万没有见到毛主席的人滞留在广场上，哭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深夜，他们也陪着掉泪。天亮时清场，光鞋子就装了几大车。她要我们一定守纪律听指挥，并送给我们一人一枚毛主席像章，是最早的那种，只有指甲盖大。我未来的姐夫也出现了，送了我们各一套军装。于是我就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全副武装起来，昂首阔步，得意非凡。

学校广播里每天播送着文化大革命的捷报，鼓动我们到北大清华等大学里参观“革命运动”。说实话，我虽然披了一身革命闯将的皮，脑袋里对这场运动还是一锅浆糊，对大字报满天，人群汹涌的校园没有兴趣，一心想的是见到毛主席。而喇叭里却不说什么时候毛主席接见。我问老师，老师说这是“秘密”，他们也不知道。我对北京的印象，是从小学课文《北京的秋天》中得来的，对诸如北海荡浆，长城雄姿，颐和园美景之类，倒是心仪已久。于是去了颐和园，这才发觉兴趣在游山玩水的革命师生大有人在，巨大的园子里到处人山人海，我和一位高中同学围着湖转了一圈，听他讲了许多故事，与革命一事无关。

到北京几天后天气骤凉，从成都出发时我只穿了两层单衣，风一吹直掉清鼻涕。一天晚上，一位中年女老师查铺，发现我有些不正常，一摸额头叫起来：“这

孩子在发高烧！”未几便有三五个人围上来，给我考体温喝水吃药忙了好大一阵。吃药后我发了一身大汗，醒来觉得被窝里湿漉漉的，但感觉舒服多了。女老师又拿来一件春秋衫给我加上。我离开北京时竟没想到要物归原主，多年以后想起来都覺得后悔。

望眼欲穿的等待

10月18日凌晨，我们被广播喇叭唤醒。每一个人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动作迅速地起床吃饭，每人还分发了两个馒头带上，在夜色中列队出发。天亮时到了北京院校集中的大学路，大家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在街道两旁列队，最前排的人席地而坐，第二排的人跪着，然后按个头高矮依次排列。一位解放军宣布：革命师生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今天我们要接受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话音未落，便被“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淹没。接着宣布纪律：保持队形，每个人不能改变现在的位置，不准随意走动。大家都规规矩矩地遵守。我们这才明白，毛主席这次接见不是在天安门，而是要乘车和我们见面。想起大姐讲的上次接见的情形，我觉得很幸运，这街就那么宽，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毛主席！想到此，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接下来是歌声的海洋，每个人都憋足气力发出最大的吼声，一曲又一曲无休无止，其间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有节奏的呼喊。解放军的宣传队在路中央跳着动作简单整齐的舞蹈，手中挥舞着毛主席的红小书，这种巴掌大的毛主席语录刚刚开始出现，令人羡慕不已。不时有学生从队伍里跳将出来，豪情万丈地指挥唱歌。在这里我学到两首最新的颂歌，一首叫《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一首是新疆调的《万岁，毛主席》：“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嘿！万岁万岁毛主席！”结尾一连唱十个万岁，节奏感鼓动性极强。

就这样不停地唱啊叫啊，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之间有人叫，“毛主席来了！”随着这一声叫喊，街道两旁的人群如飓风中的树林般舞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如山呼海啸。叫了好大一阵，却没见有汽车过来，呼喊声便逐渐小了下去。于是又开始唱歌。唱着唱着，前面的人又骚动起来，大家又以为毛主席来了，又

是一阵欢腾，闹了一阵还是不见动静，又平息下来。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一次又一次在这样的轰动中度过。先是隐隐约约的喧嚣声如远方的雷声，由远及近由弱变强由慢变快，顷刻间成为巨大的声浪扑面而来，将人群像炸药似地轰然引爆，前面的爆炸又引燃后方的爆炸。当我们轰动起来时，前方的轰动已经平息；我们平息了，后面的队伍才开始轰动。而此时，又一波轰鸣正在从前方某处爆发，滚滚而来。90年代中国足球狂热，我在体育场里看见掀人浪，觉得很像那时的情景，哑然失笑。

时间已近中午，我们在街上站了七八个小时了，还不见毛主席的踪影，轰动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减弱。“不要理他，又是刮地皮风！”一个同学对我说。人们开始松懈，队伍也不那么整齐了，有的人脱离队伍蹲到一边休息，有的掏出馒头啃，有人到处找水喝，路边用帆布围起的临时厕所前排起了长队……

神圣的瞬间

神圣的一刻来得如此突然和短暂，和若干次轰动一样，喧嚣声由远及近，但我觉得这次非同以往，来得如此迅猛强大，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震撼力，一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前排坐着蹲着的人全部蹦了起来，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所有人都发出竭尽全力的叫喊。

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声浪，一辆绿色敞篷车快速驶来，毛主席双手扶着栏杆，从我眼前不到十米的距离经过。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身躯挺直，神色庄严，脸色黑里透红，身躯高大伟岸，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神圣！

这一刻我脑袋一片空白，看不见周围的人群，听不见人们在喊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

伟大的身影一晃而过。紧接着第二辆是林彪，比我想象的矮小瘦弱；第三辆是周总理，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第四辆没看清，好像有康生江青陈伯达，陈伯达的大眼镜很显眼；然后是刘少奇，神色凝重，脸色灰暗，高大的身躯有些驼……能记住的就这些。

转眼间车队消失，人群顿时像炸了锅似地狂呼乱叫起来，方才整齐的队伍崩堤似地散开，满大街成了欢腾的海洋，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是泪光闪闪，欢呼声响彻云霄：“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

我这才发觉，自己的嗓子已经不能发声了……

有喜极而泣的泪水，也有痛苦的嚎啕，这是那些没有看到毛主席的人发出的。其中有个子矮小被挡住了视线的，有被折腾麻木溜一边休息的，更多的是去拉屎撒尿的。车队到达时，所有的临时厕所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那一瞬间，厕所外面排队的人已经挤不进队伍，里边站着蹲着的跑出来时，车子都过完了。我亲眼见到一个从厕所里跑出来的男孩在哇哇大哭，一只手还提着裤子。一位当时正在厕所外排队的同学告诉我，他以最快速度跑回来时，只能看见后脑壳和手，只有用尽全身气力跳起来看。我问看到没有，他说“只看到刘少奇一眼”，说完泪水就滚出来了。

事后大家议论，检阅车队实在是走得太快了，估计速度有三四十公里。有人说，这条路已经是检阅路线的尾端，车队在长安街走得很慢的，到这里速度就加快了。有人说是因为这里街比较窄，如果开慢了，人都拥上去，那还得！回想车队经过后瞬间出现的情景，也真是。但错失时机的人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翻来覆去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成群结队向天安门方向走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滞留在北京，直到下一次接见。

“今天，1966年10月18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是我当天日记的开头，和几乎所有见到毛主席的人写下的文字开头一模一样。

“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回到成都我的嗓子才恢复。这时我兜里有八块五毛钱，也就是说，此行我只用了一块五毛钱。确实不是有意节省，而是没有用的地方。短短十来天的时间，我觉得成都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街道似乎变狭窄了，阴霾的天空下大字报大标语满街飞舞，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

告诉父亲我见到了毛主席，他的神色却不像我想象的高兴。问了问和大姐见面的事，便郑重其事告诉我：你妈妈正在接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审查，你要相信，她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不是坏人，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看来为告诉我这件事，他已经思虑良久。

从文革开始，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母亲。我也并不在意，从小到大，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对我们是家常便饭。但听父亲这样一看，我感到事情严重。后来我

才了解，母亲文革初期就挨整了，其中主要罪行，是她 1962 年在省委党校轮训期间的“反党言论”。当时党校轮训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发扬党内民主，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我母亲讲了真心话，批评不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修建豪华的锦江宾馆（这个 1959 年动工、1961 年落成的豪华宾馆，至今仍然是成都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用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话来形容。文革初期，省委将 1962 年党校轮训期间的言论作为重点来整，我母亲因此被关押批斗。父亲煞费苦心，是要我有思想准备。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只觉得很委屈。从小到大，母亲的一言一行，都让我觉得她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啊！

我想用见到毛主席的喜讯，给母亲一些快乐和安慰。我闻到她被关押的学校，大概是被我的一身披挂镇住了，学校红卫兵将母亲带来和我见面。几个月不见，母亲的模样已变得让我难以置信，我费了好大劲才没让眼泪掉下来。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见到毛主席了？我说见到了。母亲说，你才 15 岁就见到了毛主席，妈妈参加革命快三十年了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你要珍惜这个幸福，听毛主席的话，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只说了几句，就被红卫兵押走了。

母亲成了坏人，我自然也就成了狗崽子，这使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我开始认真学习最新最高指示，阅读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认真思考毛主席为何要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场天翻地覆的运动到底是因为什么？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是谁？我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时，局势急剧变化，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变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矛头向下”转到“矛头向上”，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出现“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

学习和思考的结果，我投身了造反派队伍。

【文革遗产研究】

自相矛盾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五

顾 土

文革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自相矛盾的“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一概无法自圆其说。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从未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绝大多数人甚至连最起码的逻辑思维都不具备，所以，文革得以顺利发动，成功延伸，不断进行，而且深入人心，其思想遗产绵延不绝，至今还能不时“发扬光大”。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或者说稍稍经过一点逻辑训练的人，在文革中，都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执著的人当然就会愤然反抗，比如张志新，比如遇罗克；处于文革权力旋涡之中的人则难免痛苦与矛盾；狡诈的人不妨将自己的人格一分为二。当然，这些人都属于极少数。

德国的纳粹思想虽然祸害人类，但是，其空间扩张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和种族血统纯粹论，以及为推行这些主张、理论、主义而实施的专制独裁，在德意志民族那里也有自圆其说的一面，所以煽动起全德意志的人民：“你撒了个弥天大谎，并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深信不疑。”戈培尔的这句名言，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能不说的确是个事实。第三帝国的思想和文化来源，从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特莱希克到尼采、海德格尔、瓦格纳等人，他们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创造是智慧的结晶，至今仍在影响我们。他们强调总体、强调国家的一面，不能不说也是一些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选择。中国文革与德国纳粹相比，相同的是，文革同样可以鼓动起全国人民；不同的是，文革的思想、行为，从表到里，无一不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其自相矛盾的习惯延续至今，仍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的尴尬。

《国际歌》和《东方红》是整个文革中全国人民必唱的歌曲，文革最高潮时还达到了天天唱的地步。直至 1978 年，在思想解放的启发下，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两首歌曲的内容原来截然相反，互相矛盾，根本对立。由这两首歌曲并行高歌的过程即可以看出文革期间中国人的思维状况。

资产阶级代理人从何而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句话在文革中家喻户晓；马列主义也是文革中最为普及的词语，无处不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更是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必读之物。可是，

凡是读懂这些著述的人，凡是用这些著述中表达的思想去分析现实中国的人，都不能不怀疑直至反对文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文革，文革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怪不得张春桥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在几十年中国的政治话语里，修正与发展的使用频率最高，但界限也最为含混，究竟什么是修正？什么又是发展？其实，修正就是与原来的有所不同，而发展也是与最初的不大一样，两者没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修正是指责别人，发展是自我标榜。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修正还意味着被打倒、被批臭、被清洗，而发展则成了“四个伟大”。

文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口号贯穿文革始终。如果说中国有王朝复辟、君主复辟、封建主义复辟、半殖民地复辟、专制制度复辟的危险，都还合乎情理，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资本主义的时期，这是中共一向都承认的历史事实，在文革的历史表述中也没有改变这一提法。而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有定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可见，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在《五一六通知》中表达非常明确。难以说通的是，中国根本没有进入过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里，尽管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培育的资产阶级数量也极少，1949年以后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那么多的代理人不知从何而来？如果说少数知识分子和中共领导人曾留过西洋，去过日本，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文革中揪出的大多数人根本没见过资本主义，连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这样有点资本主义模样的大城市都没去生活过，从他们的经历、环境和受教育背景来看，想走的话也是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道路，或者称回头路。叫他们是地主、小农和手工业者的代理人，或者说他们是军阀、土匪的代理人，远比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更具说服力，起码在1949年之前，他们

与这些阶层和人物更为贴近。

资产阶级发育自前资本主义时期，第一代资产阶级也没见过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样，但是，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却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1949年以前的中国商品经济并不发达，1949年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也由于长时间物资的极度匮乏，票证制度掌控一切，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基本处于消亡状态。所以说，1949年前的资产阶级很脆弱，其后根本就不可能再产生资产阶级，经过改造之后剩下的那些资产阶级不是夹着尾巴就是红得发紫，早就不成气候了。退一步讲，即便有一些人，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向往民主制度，1957年也被超额且“扩大”地扫荡干净，沦为社会监控对象，不可能形成任何威胁。可是，文革一开始就宣称中共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大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并且揪出了大量走资派，文革中又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说法，文革后期还发明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将工资制，将普遍贫困中的微弱差别，都当作了资产阶级产生的温床。这种凭空产生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既不合乎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所信仰的唯物主义。至于当时的极少数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享受了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住房、出行和物资特供待遇，也未必就一定成为资产阶级，因为特权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而且，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都在享用这一特权，他们并没有将他们自己也划归资产阶级之列。

文革之所以要以资产阶级为目标，在于所遵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只能对准资产阶级，如果是反对前资本主义的话，依照当时的历史话语，就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了。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的叙述已成定论，无法超越；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斗争，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范畴。文革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诩，所以其思想不能不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问题，不能不“创造性”地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谈及的事情。

对唯物主义的最大反动

自相矛盾，在文革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表现在一切领域。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文革的基本词语，人人每天不离口，连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辛亥革命，中国打倒了皇帝，也就是说打倒了万岁，从此进入了共和。

“喊万岁，是人类文明的堕落”，这是政治学家张奚若的话。但是，喊万岁在文革前已经十分普及，在文革中更是达到极致，发展到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地步，超过了历朝历代。语录、像章、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言不离“毛主席说”，在文革中也是登峰造极，可谓集古今中外个人崇拜之大成。这些极度的个人崇拜，比资本主义都落后，不但全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对唯物主义的最大反动。

上山下乡，是一场文革前已经开始，文革中进入癫狂状态的人口大迁徙，初中生、高中生、市民纷纷远离城镇，带着户籍，或奔赴边疆或返回原籍或移居贫困乡村落户，成为农业户口。这场迁徙，当初的宣传非常明确，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炼一颗红心；但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还有一句口号也叫得非常响亮，叫做“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两种说法实际互相矛盾，连世代居住当地的那些“教育者”都改变不了的落后面貌，“受教育者”又如何去改变呢？连自己的落后面貌都无法改变的群体，凭什么去教育别人？

去农村接受锻炼，在文革前已经时兴，文革时更成为必须，学校师生、机关人员、科学院所的研究者及其家庭，或长期或短期，无不经历过这道体力劳动关。锻炼的原因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罪名，称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劳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江西余江县，一年以后，当地的农民都夸奖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农活手艺高，南瓜种得棒，超过了老表。与我父亲同屋而住的冯其庸先生也告诉我，少年时代，他白天干农活儿，夜晚在蚊帐里读书。中国是个农耕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许多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原本出自农民家庭，农田劳作是生活的一部分；1949年前，除了极少数大户人家外，多数殷实和小康农民的家庭，老老少少也都下地干活儿，毛泽东的家庭最具说服力；而且，干农活儿并不难，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多数人的本事，即使不会农活儿的人，也是一学就会，如果有知识有文化的话，技术可能还高出一般农民。这原本是个常识，只是在那个年月被彻底歪曲了。我曾随工人去农村支农，在南北乡村都干过农活儿，终于明白，原来生长在城市的工人也是五谷不分，北方农民不会南方农活儿，南方农民照样不懂北方农活儿，就好像农民不会工业生产、工人不会教书那样。实践出真知，这是文革的日常用语，可是，在判断时却又是反其道而行之。

着军装的比不着军装的革命，军人比非军人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文革中最通行的一种用人尺度，直至出现现役军人接管政权、全国各界争穿军装的场面。文革初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现役军人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进了政治局；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多半成了现役军人；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军队将领接管地方政权；支左时，大量下级军官又掌握了学校、机关、厂矿。其实，那些不穿军装的中共干部十几年前大多也是军人，有的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有的是解放军或是游击队，怎么脱下戎装十几年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如果不离开部队，命运是否就可以相反？我的父母所在学校无论教授还是领导大多是中共老党员，参加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不在少数，当一批师团职军宣队员进驻后，有人就议论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不服从组织分配，留在部队，现在不也成了军宣队吗？凭入伍资历，肯定还是军宣队领导呢！老军人不如新军人，退役军人不如现役军人，经历战争洗礼时间长的不如时间短的，这样的文革思路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文革中，读书越多，学历越高，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或是干脆就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我们这些中学生也不断被告诫要好好改造思想，向工农兵学习。所谓工农兵，就是那些读书少、学历低，或者目不识丁的人，依照当时的话语，他们才是最高尚最干净最有觉悟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说法。既然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的地方，何不干脆将所有学校撤消，由文盲直接去当工农兵，岂不省事？何必先灌输知识，培育成资产阶级，再费力去改造！尤其是那些来自乡镇的学子，原本就是农民，花费很多力气和资财，拐了个大弯，结果又转回到起点。

一场文革下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清洗，其后果，除一个人无比正确无比英明无比革命以外，几乎所有和他一同打江山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右倾、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的结局只能得出一种结论，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和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的反右等政治运动，原来是在伟大领袖一人英明领导之下，由一大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持操纵下进行的。如是结论，使文革与前文革的政治运动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因为承认了文革，就必须抹杀过去；承认过去，则不能不质疑文革。

我们从没有接受过理性洗礼

自相矛盾，在文革中无处不在，绝大多数人浑然不觉，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进行过理性洗礼的结果。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去思索这些矛盾，也不会通过这些矛盾去怀疑文革。

最高权威是终极标准

对于一个没有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自相矛盾不被怀疑的最大保障就是绝对的最高权威、不容质疑的精神领袖，这是社会价值的最后依托，也是是非判断的终极标准。林彪事件之后，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回顾中共九大时林彪如日中天的情景，都会察觉出其中的荒谬和虚假，都会因此怀疑并反对文革，动摇当权者的威权。但是，事实是，文革不但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林彪事件顺利地纳入文革的运行轨道，将林彪之死也当作文革的胜利果实。对文革最不利的一次事件，却可以转而增加了文革必要性的砝码，进而增强了文革的合理性，这在理性社会根本不可思议，但当人们绝对信服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一切以最终权威的意志为准时，所有荒唐和不合理都不妨自然化解，还可以成为伟大权威更加伟大的合理注解。苏联与中国不同的是，斯大林之外，还有一个更高权威列宁，列宁活到了十月革命以后，而列宁的权威又是有限的，因此，否定斯大林比较容易。德国尽管是一个经受过理性洗礼的国家，但纳粹依然能够上台并树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希特勒，这在于，纳粹所做的一切都以德意志民族利益为号召，有自圆其说的一面，在纳粹理论中，无论对外侵略扩张还是屠杀犹太民族，与这一利益并不矛盾。然而，文革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甚至对中共执政利益都看不出有任何好处，自相矛盾处比比皆是，却畅行无阻十几年，这证明，中国的理性之微弱，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最高权威之强大，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可以说，中国社会是二十世纪无理性的典型，苏联是半理性的典型，而德国则是理性负面的典型。

艺术思维等于大跳跃

除了接受者的无理性之外，自相矛盾也与文革中畅行的艺术思维方式有关。

文革中的最高统治者和一些当红人物，偏好文艺。他们的思维，说文雅一点，叫浪漫主义，说白了，就是大跳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缺乏逻辑，没有推论。他们思考问题、品评是非，都是两极化，走极端，不顾前后，不计过程，此一时

彼一时。林彪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到“发动反革命政变”不足两年，这两年是他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没有人能说清；陈伯达从毛泽东秘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下变成“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一贯反共”，究竟是他隐蔽太深，还是别人太糊涂，或是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也没有人深究。江青在被审判时有句名言，“你们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这也是文革中的通行方式。

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截然相反，可以夸张，不妨跳跃，以动感取胜，随意延伸亦无不可，最好还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所以，这样的思维特别适合鼓动大众，因为大众的情绪从来都是非理性的，比较容易接纳形象，排斥概念、判断、推理。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首歌，一首诗、一篇檄文，比理性著述更容易掀起革命，鼓动争端。文革中用形象思维描绘政治斗争是一大景致，这对没有理性的群众来说带有极强的煽惑力，现场感特别突出。一提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人们记住的就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败坏林彪的形象，这首顺口溜可以说超过了任何理性说辞；而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语录歌，更是深入人心，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亲近效应。“打着红旗反红旗”、“跳梁小丑”、“残渣余孽”、“牛鬼蛇神”、“阎王殿”、“两面派”、“黑五类”、“一小撮”、“大毒草”、“小爬虫”、“内奸”、“走狗”、“掺沙子”、“揭盖子”等等，充斥于文革政治话语里的这些语汇，色彩浓厚，形象生动，充满了俚俗气和肢体动作，在大众脑海里留下鲜活的印象，十分轻易地就左右了大众的心理。文革中对人的批判斗争，固然残酷凶恶，但戏剧成分很重，表演意识尤为明显，喷气式、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画漫画、叼破鞋、戴乒乓球项链等等，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将这种斗争都当成了大舞台，舞台形象替代了一切。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形象中，只有黑白，没有是非，任何一个不具备理性思维的人，无不乖乖地被吸引。

领袖竟没有完整著述

很难想象，文革，这场持续十几年，影响全世界，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命运，席卷社会各个角落，至今都左右着我们思想的特大政治风暴，尽管被说成是“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的最高权威，其思想所能显示的都是只言片语，没有任何著作阐述，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既无框架，

也无体系，缺乏一贯性，最长的不过是一张“大字报”，根本算不上理论文字。指导整个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东一句西一句，不但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而且出处和背景也含混不清。评论一部古典小说《水浒》的寥寥数语，就可以掀起一场运动；“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一块巴掌大的纸头，草草几个字，就可以决定国家前途。看起来，这似乎不可思议，但群众一旦成为信众，尤其正处于高度亢奋中的信众，相比较那些大块理论著述而言，警句、预言、定义、口号、台词式的语录体，恰恰更符合他们的心理。由领袖代他们思考，替他们指路，为他们判断，正是信众的特征，信众需要的就是方向指引、意志激励、行动号召和斩钉截铁的结论。语录体的发号施令，无需推论，也不用顾及前因后果，所以，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当然也不会被轻易察觉。

诡辩论帮了一个大忙

明明是唯心论，却高喊唯物主义，明明背离马克思主义，却天天学习马恩著作，这是文革期间自相矛盾得以掩饰的重要原因。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戈培尔的名言中衍生出来的这条定律，在文革期间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中的红人，仅仅从他们由盛至衰的过程里就已经暴露出文革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所有舆论工具千百遍的宣教以及各种文件的反复学习，使多数人不能不接受了与文革思路相一致的说法，信以为真。此外，诡辩论的普及，也使所有的自相矛盾都被合理地解释过去。

文革中，中国人的各种政治学习达到最高潮，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专门的学习时间，一切都可以为政治学习让路，机关可以不办公，商店可以不营业，工厂可以不生产。辩证法，应该说是文革学习的一大成果，几乎所有人，包括中学生，都在大讲特讲唯物辩证法。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政治学习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天天读报纸，学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文章，从报章上面，老师和同学们学会了用哲学讲话，好像什么都是“一分为二”，总是用“事情没有绝对的”这句话解说一切。需要批判一个人了，用一分为二，那个人的缺陷便被无限放大；需要赞美了，也不妨用一分为二，那个人的长处又被尽力夸张。因此，他们的大批判和讲用稿永远都有理。一位政治老师，只要我们同学争论问题，他都用“没有绝对的”来分析各方的观点，结果，同学总是没理，老师老是有理。因为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没错。直至最近，他年届 80，同学和他讨论问题，他依然如此。你说自

由，他说没有绝对的，你说民主，他说没有绝对的，你说公正，他又说没有绝对的，你说平等，他还说没有绝对的。同学们都已一把年纪，最终还是错的，老师总是正确。老师之所以正确，因为“事情没有绝对的”实际是个伪命题，既然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人所说的问题显然都是以相对为前提，既然根本就没有绝对的，那“没有绝对的”也就没有必要被重复。“事情没有绝对的”这一命题的虚伪性自文革以来一直未被点破，因此近来又被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用来当作不平等、不公正、贫富日益分化的辩护辞，还真蒙住了不少人，以为他们确实有理。

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是什么，文革期间并没有多少人清楚，人们所学会的都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文革辩证法，或者称实用辩证法，也就是一切为文革现实服务，为文革最高权威的意志服务，为文革永远有理服务。这种辩证法，已经成了诡辩论，当现实需要对立时，无论如何都可以对立，当现实需要统一时，不管什么都能统一。于是，文革的所有自相矛盾都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得到了无比正确的解答。

【小资料】

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死亡人员名单

唐金鹤 整理

姜文波

男，1946年生(?)，河北唐山人，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给0班学生。1968年4月27日，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二号楼内被团派成员追赶，在二号楼的西北部坠楼致死。

谢静澄

男，1945年生，江苏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904班学生。1968年4月29日下午，在团派前往九饭厅抢粮时，在九饭厅前的广场上，被团派的汽车强行撞倒，碾压致死。

孙华栋

男，1946年生(?)，北京市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无01班学生，学校航海队骨干队员。1968年5月15日傍晚，孙在校园内骑自行车途经一教学楼时，被团派抓进一教楼内，后遭到连续毒打几个小时，被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以致死亡。孙死亡后被团派人员送到阜外医院，然后弃尸医院，逃之夭夭。

许恭生

男，1944年生，江西临川人，清华大学冶金系焊8班学生，学校击剑队队员。1968年5月30日，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在校园内的东大操场北侧荒地上，不慎摔倒后，被一拥而上的四一四派人员用长矛乱刺，许失血过多而死。

卞雨林

男，1947年生(?)，江苏泰兴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化003班学生。1968年5月30日清晨，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在校园内东大操场西侧跑道的北半部被毒箭射中，当场倒地，口吐白沫，很快死亡。

段洪水

男，19岁，清华大学修缮科工人。1968年5月30日清晨，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攀登梯子强攻东区浴室，被守楼的四一四派的长矛刺中，由梯子摔下，当场死亡。

刘承娴

清华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女，1931年生，河北省人。1968年4月中旬，清华井冈山兵团一派关押了所谓“罗文李饶”案中的罗征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均为清华大学中层干部)等人。1968年6月12日，刘承娴在团派的关押楼中坠楼，被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大手术后，昏迷中又被团派人员从病房虏走，6月18日不幸身亡。

朱玉生

男，1946年生(?)，江苏徐州人，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房01班学生。1968

年 7 月 4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科学馆大楼外的西北角值班放哨，被设在闻亭的团派岗哨发现后开枪，朱中弹而死。

杨志军

男，1946 年生(?)，河北保定安国县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 01 班学生。1968 年 7 月 5 日早上，在科学馆楼内，由墙壁上的观察孔向外观看时，突被从观察孔射入的一颗子弹击中颈动脉，当场倒地，血向外喷射不止，很快身亡。

杨树立

男，河南人，清华大学动农系实验室学员。1968 年 7 月 6 日中午，乘坐土坦克由动农馆返回焊接馆时，从二校门西南山包地堡中射出的穿甲子弹打穿土坦克车钢板后射中杨，弹头停留在其脊椎内，杨中枪弹而死。

钱萍华

女，1944 年生(?)，江苏苏州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 802 班学生。1968 年 7 月 18 日中午，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时期，她上身穿着天蓝色短袖衬衫，下面穿了一条黑裙子，从苏州家乡返回学校，在清华大学主楼前被从 9003 教学大楼方向射来的子弹打中肺部而死。

范仲玉

男，清华大学修缮科工人。(?)死亡时间、地点有待进一步核实。

范崇勇

男，北京某中等技术学校学生。(?)死亡时间、地点有待进一步核实。

说明：这份名单摘自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一书附录，原书中除去两位工人和一位外校学生外，其他人的简介均附有照片。此书出版后，对书中提到的一些人的死因和死亡时的具体情况在清华校友中有争议。比如，对卞雨林的死，有

人认为只能用“疑毒箭”，他火化时，414 把他的“组织”取了一块泡在药水中，准备以后进行化验，工宣队进校后被拿走。杨志军的死，有人认为不是在科学馆墙上有一个洞被老团射进子弹，而是朱玉生死后老四在门口做了一挡墙，上有一观察孔，“血向外喷射不止”的形容也有人认为有误差。总之还需进一步核实。

【小资料】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唐少杰 整理

一九六六

史明远

男，1936 年生。清华自控系助教，共青团员。1966 年 7 月 5 日在京郊十三陵服毒药身亡。

郭兰蕙

女，19 岁。清华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66 年 8 月 20 日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遭红卫兵同学的“批斗”，服毒药后，被阻拦救治，身亡。

侯协兴

男，1937 年生。清华建工系给 7 班 学生。1966 年 8 月 26 日在清华 2 号楼五楼（层）上，跳下自杀。

刘澍华

男，1937 年生。清华附中物理教师，附中校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1966 年 8 月 27 日凌晨在清华公寓小区，从高烟囱跳下自杀。

王 章

男，1933年生。清华行政生活处第三饭厅炊事员。不满于清华工作组的做法，在清华生物馆内被关押，1966年9月25日上吊身亡。

一九六七

佟英亮

男，1908年生。清华精密仪器系门卫。1967年1月9日在北京林业科学院附近上吊身亡。

张怀怡

男，1945年生。清华工程数学力学系力901班学生，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因其日记被发现有“反革命言论”，受到批判，1967年3月25日跳楼身亡。

李磊落

男，22岁。清华电机系电9班学生。1967年8月7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

肖化时

男。清华无线电系无706班学生。中共党员。1967年8月11日参加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横渡长江的活动中，与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致死。

刘 庆（刘仁堂）

男，23岁。清华无线电系无91班学生。1967年8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羌于正

男，22岁。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农9班学生。1967年8月29日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周定邦

男，1930年策。清华水力系水力学教研组讲师。1953年加入中共，1957年左右被开除党籍。1967年12月25日在宿舍跳楼身亡。

一九六八

黄报青

男，1929年生。清华土木建筑系党支部委员、副教授，民用建筑教研组副主任。中共党员。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罗征敷

男，28岁。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1968年4月4日团派抓捕其兄罗征启未遂，将其绑架，遭毒打后被用棉丝塞嘴装入汽车后箱内拉回清华，窒息死亡。

姜文波

男。清华建筑系给01班学生。1968年4月26日被团派武斗群众追趕，跳楼摔死。

谢晋澄

男，24岁。清华自动化系自94班学生。1968年4月29日武斗中被团派汽车生撞压致死。

孙华栋

男。清华冶金系焊82班学生。1968年5月15日被团派武斗人员绑架，遭毒打致死。

许恭生

男，24岁。清华冶金系冶82班学生。1968年5月30日大武斗中，被414派群众长矛乱刺致死。

段洪水

男，19岁。清华修建队工人。1968年5月30日武斗中，在攻楼时被414派群众长矛刺中，摔下梯子致死。

卞雨林

男。清华化工系003班学生。1968年5月30日武斗时，胸口被团派武斗者射出的毒箭（体育比赛用箭）击中致死。

周久庵

男，1907年生。清华图书馆职员。民盟盟员。1968年6月4日在北京大学靶场西侧水坑内溺水自杀。

刘承娴

女，清华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党员。1968年6月12日在团派看守处跳楼死亡。

张义春

男，1921年生。清华体育教研组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朱育生

男。清华建筑系房01班学生。1968年7月4日武斗对峙中，在科学馆外战壕中被枪弹击中致死。

杨志军

男。清华电机系电01班学生。1968年7月5日武斗对峙中，在科学馆外修筑战壕时被枪弹击中致死。

杨述立

男。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实验员。1968年7月6日驾驶土装

甲车外出购菜，被团派开枪击中心脏致死。

钱平华

女，25岁。清华自动化系自82班学生。1968年7月18日从家乡返校，在清华主楼前碑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韩忠现

男，36岁。北京第一食品厂革委会委员。1968年7月27日在9003大楼休息时，被团派长矛刺死。

李文元

男，36岁。北京橡胶四厂工人。1968年7月27日在9003大楼外被团派开枪打死。

王松林

男，36岁。北京第二机庆厂副科长。1968年7月27日在学生宿舍10号楼里被手榴弹炸死。

潘志洪

男，30岁。北京供电局工人。1968年7月27日在学生宿舍12号楼附近被手榴弹炸死。

张旭涛

男，39岁。北京541厂工人。1968年7月27日在东大操场南端的撤退路上被团派长矛刺死。

范崇勇

男。清华中等技校学生。1968年7月28日凌晨乘车撤离途中，自己人的手榴弹拉环拉出，因翻车爆炸致死。

范仲玉

男。清华修建队工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乘车撤离途中，自己人的手榴弹拉环拉出，因翻车爆炸致死。

赵晓东

男，1910年生。清华附中体育教研组组长。中教二级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1968年8月9日在清华附中四楼（层）跳下身亡。

陈祖东

男，1912年生。清华水利系施工教研组主任，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查他自己和别人的“历史问题”，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黄志冲

男，1934年生。清华工程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1968年9月26日在清华荷花池二宿舍本人住室自缢。

周华章

男，1918年生。清华基础部教学教研室教授。民盟盟员。1968年9月30日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徐毓英

女，1932年生。清华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不详）。

王慧琛

女，41岁。清华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11月6日在北京香山公园与丈夫殷贡璋一起上吊自杀身亡。

殷贡璋

男，42岁。清华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11月6日在北京香山公园与妻子王慧琛一起上吊自杀身亡。

杨景福

男，36岁。清华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11月6日跳楼自杀身亡。

程国英

男，1922年生。清华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于贵麟

男，1928年生。清华自动控制系工人。1968年11月28日在陶然亭公园南豁口投河自杀。

李丕济

男，1912年生。清华水利系教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1968年11月29日跳楼自杀身亡。

邹致坼

男，57岁。清华机械系教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12月10日跳楼自杀身亡。

程应铨

男，49岁。清华土木系讲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年12月13日投水自杀身亡。

李文才

男，46岁。清华工程化学系副主任。副总支书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9年1月9日在家中上吊自杀。

路学铭（路学周）

男，41岁。清华体育教研室讲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9年2月8日跳楼自杀。

李玉珍

女，58岁。清华图书馆职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9年4月23日跳楼自杀。

王大树

男，31岁。清华电机系助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9年5月24日在大兴县红星公社一村庄附近服毒自杀。

一九七〇

荐 健

男，1946年生。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汽车02班学生。共青团员。1970年3月在泰山舍身崖跳下身亡。

邢孝若

女，1907年生。清华图书馆在编临时工(采编)。1969年12月29日在清华16公寓跳楼重伤，1970年5月19日死亡。

一九七一

杨哲明

男，1933年生。清华精密仪器系工程制图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讲师。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内上吊身亡。

栗乃志

男，1946年生。清华试验化工厂学生党支部书记、教师。1971年2月11日在清华2号楼四层楼顶层跳楼身亡。

陈贯良

男，1946年生。清华电机系01班学生。共青团员。1971年3月在清华大学江西南昌郊外鲤鱼洲农场跨越马路时，趁势钻进行驶中的拖拉机下，被辗压身亡。

韩启明

男，1923年生。原清华大学汽车队司机，后调原籍河南杞县医院，清查“五一六”时调回清华重审。1971年7月18日在清华校外大石桥处割断大动脉血管自杀。

一九七六

周寿宪

男，1925年生。清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1976年5月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说明：上述个别人士姓名的准确写法还有待核实，死亡时间、地点及细节还有争议，谨请见证者或知情者指正。